



中国教育科研参考

2017年第10期
总第(404)期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编

2017年5月30日

目 录

中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的学术生态研究 ——基于中国高教学会历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计量分析.....李 威(02)	
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与发展探析.....迟景明 陈晓光(05)	
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变化趋势 ——基于2005—2014年379篇博士论文的研究.....童 星(10)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相关因素分析 ——兼论其布局的均衡性.....李硕豪 李文平(14)	
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选拔问题研究 ——基于中国15所院校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分析.....王运来 全守杰 陈滔娜(21)	
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群体特征研究李明忠 褚照锋 邵 攀 魏丽颖 张 菊(25)	

编者的话：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确定高等教育学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历经30余年的发展，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不断推进，学科体系日渐成熟，发展路径日渐清晰，培养了众多从事高等教育研究与管理实践的专门人才，为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当前，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所面临的问题、挑战以及应对策略的探讨正逐步引向深入。如何调整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策略，全面提升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与整体水平，成为学界必须面对的课题。本刊以“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为选题，从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学科建制、发展路向、学术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集中选编了若干文章，供读者参阅。

主编：王小梅 本期执行主编：范笑仙 责任编辑：王者鹤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中教仪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国高教研究》编辑部
邮编：100082 电话：(010) 59893297
电子信箱：gaoyanbianjibu@163.com
网址：www.hie.edu.cn（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观点栏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的学术生态研究

——基于中国高教学会历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计量分析

李 威

“学术生态”是生态学与教育学交叉学科的概念，特指学术共同体追求学术的有机环境，意蕴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创生过程。良好的学术生态环境是一个学科发展繁荣的前提，而博士生毕业论文质量是一个学科学术生态的重要显性特征，往往能够窥一豹而知全貌。自2004年开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作为高等教育学科的最高学术机构，开展了“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评选工作，目前已举办了10届，共评选出优秀博士论文58篇（其中2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该奖项在高等教育学领域已经成为品牌，引领了博士生培养理念的改革，增强了博士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研究能力。

一、历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的计量分析

（一）入选论文所属学校的分布情况

就58篇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情况来看，论文来源学校比较集中（见图1），主要有北京大学（15篇）、厦门大学（14篇）、华中科技大学（11篇）、华东师范大学（7篇）、北京师范大学（4篇）、南京师范大学（2篇），清华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各有1篇，反映了目前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在高等教育学和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人才培养上具有良好的积累和优势。

（二）入选论文的博士生导师分析

58篇优秀博士论文，涉及30位导师，其中指导过2篇以上“优博”论文的导师有12位（见表1）。

从表1数据可以看出，“名师出高徒”的现象较为普遍，像培养出四篇以上优秀博士论文的陈学飞、刘献君、邬大光、刘海峰、谢安邦五位导师，分别是北京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著名高等教育学者和学科带头人，因此充分保障著名学者的学术活动指导与互动时间，对于博士生的论文写作质量大有裨益。另有18位导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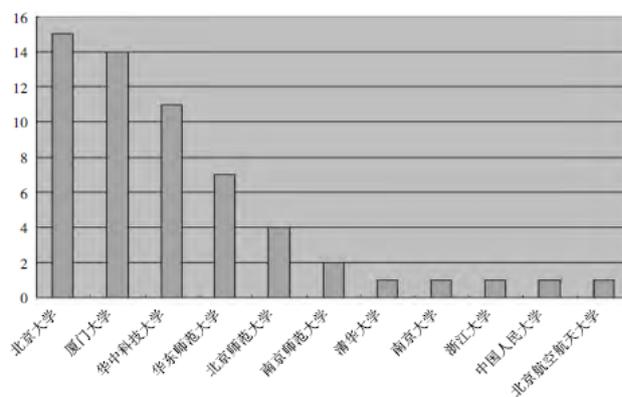


图1 历届入选论文所属学校的分布

表1 指导过2篇以上“优博”论文的导师分布

序号	博士生导师	篇数	工作单位	指导的优博论文获得者
1	陈学飞	5	北京大学	林小英、茶世俊、王书峰、涂端午、周详
2	刘献君	5	华中科技大学	周光礼、梁红、江新华、吴洪富、魏曙光
3	邬大光	5	厦门大学	王建华、胡赤弟、林莉、卢彩晨、吴凡
4	刘海峰	4	厦门大学	田建荣、李均、李兵、李立峰
5	谢安邦	4	华东师范大学	阎光才、罗尧成、周玲、张红峰
6	潘懋元	3	厦门大学	李均、谢作栩、刘小强
7	沈红	3	华中科技大学	廖茂忠、彭安臣、赵永辉
8	闵维方	3	北京大学	陈晓宇、郭海、马莉萍
9	陈洪捷	2	北京大学	沈文钦、秦琳
10	马万华	2	北京大学	杨光钦、申超
11	王英杰	2	北京师范大学	谷贤林、郗海霞
12	谢作栩	2	厦门大学	吴薇、谭敏

各培养过1篇优秀博士论文，其中不乏优秀青年学者，他们正处于学术职业的上升期，如果继续潜心学术、专心指导，将有望培养出更多的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三）“优博”论文获得者的职业发展

1. 优博论文获得者的个人特征。根据获奖者公开发表论文时显示的个人信息，笔者计算了58位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完成毕业论文时的年龄，发现获奖者毕业时年龄最小的为27岁，最大的为55岁，平均年龄为34.5岁，具体年龄分布情况见图2。由图可见，30岁以前占34%，31-35岁占31%，此两个年龄段为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的最佳创作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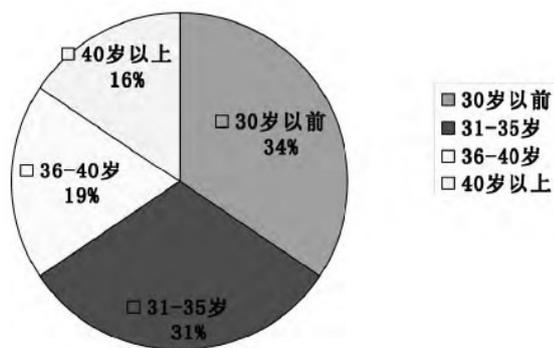


图2 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的年龄分布

从性别上分析，58位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中，44位为男博士生，占75.9%；14位为女博士生，占24.1%。从数量看，男博士生比重较大，反映出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男生在发散与整合思维、创新意识与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当然这跟高等教育学学科目前博士生生源的组成、博士生人才培养中的“性别刻板印象”的潜在影响也有直接关系。

2. 职业发展路径：从“优博获得者”到成为“优博导师”。从高等教育学10届全国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和指导教师的名单中，我们可以找到“交集”，即阎光才、戚业国、陈洪捷、丁小浩、谢作栩5位导师既是曾经的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也是新一代的优秀博士论文导师。这反映了优博论文评选不仅是一个选拔和培育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生的活动，而且对于博士生和其导师的学术职业发展都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这有助于培养未来的优秀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

（四）论文主题分布

从入选的58篇优秀博士论文的主题来看，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思想、高等教育理论、高等教育政策、高等教育实践与问题等五个方面，具体分布见图3。

从图3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理论（19篇）、高等教育实践与问题（18篇）、高等教育政策（12篇）是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关注的最重要的三大领域，高教思想（5篇）、高教史（4篇）也占有一席之地，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学术领地的分布实况。另一方面，从历年论文评选的趋势看，参评学校逐渐增多，论文内容与时俱进，而选题逐渐由早期的高教理论为主转向为近年的高等教育实践问题为主，凸显出高等教育学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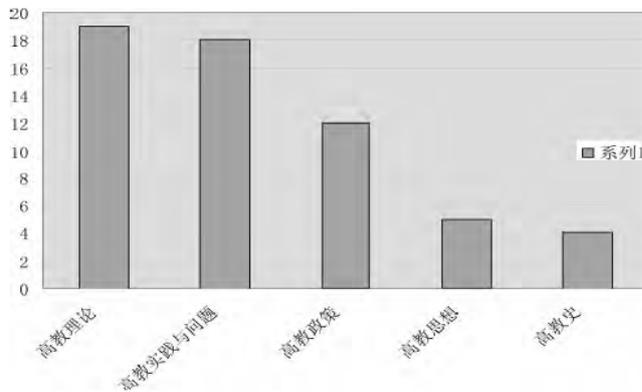


图3 历届入选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的主题分布

应用价值在不断深化。

值得关注的是，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的主题分布也能显现出各校的优势方向，比如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史研究（3篇）、北京大学的高等教育思想研究（3篇）、华中科技大学的高等教育实践问题研究（5篇），这与各校在学科发展中的方向选择侧重点密切相关，也值得进一步的培育和发展。

二、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遴选机制与判定标准

（一）遴选范围

根据中国高教学会的评选通知文本，前两届仅限于高等教育学专业，从第三届开始，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的参评对象扩展到“本年度在国内学位授予单位获得博士学位、并隶属于教育学、心理学两个一级学科下的所有二级学科及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二级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范围的扩大符合当前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实际情况，因为正如潘懋元先生指出，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学科]，教育学、心理学、公共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博士论文都可能直接涉及到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遴选学科范围的适度扩大有助于发现更多更优秀的论文，也有助于高等教育学科的学科交叉深度与学术共同体的发展壮大。

（二）遴选机制

从遴选过程来看，首先是请国内指定院校的教育学院、教育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等相关系所组织推荐本校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参加评选，然后将申请材料按规定的格式与份数报送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部。评选时先是由专家组通讯评议，后是专家复议评审会审定。遴选程序较为客观，但可

能存在以下问题：评审的专家一般都来自国内各大系所的著名学者，与被评选论文的作者或导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重合，使论文评选的公正性受到质疑，因此应该设法改进遴选程序，如论文评审的匿名性和同行评议。

（三）评定指标

从中国高教学会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指标来看，主要包括三个一级指标和七个二级指标，权重和相应评价要素见表2。

表2 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的评定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素
选题与综述（20%）	论文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60%）	选题为学科前沿，具有开创性；具有较大理论意义和较大的现实意义；研究方向明确
	对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的综述与总结（40%）	综合、全面地反映该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发展状况，归纳、总结正确
论文成果的创新性与效益（60%）	论文在理论或方法上的创新性（60%）	填补高等教育学科理论研究空白，在本学科领域达到或接近国际先进水平或国内领先水平；运用新视角、新方法进行探索、研究，有独到见解，并在相应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
	论文成果的效益（40%）	在校期间在国外及国内重要刊物发表与论文有关的若干篇文章及出版专著，获较高奖励；论文成果具有较大社会效益，对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具有较大促进作用；论文成果具有较大实用价值，为政府宏观决策提出有战略价值的政策性建议
论文体现的理论基础、专门知识及科学研究能力（20%）	论文体现的理论基础与专门知识（40%）	论文体现本学科及相关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与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论文体现作者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40%）	分析方法科学，引证资料丰富、准确，论文研究难度大，研究深入，体现出作者具有很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
	写作能力（20%）	论文材料翔实，结构严谨，推理严密，逻辑性强；文字表达准确、流畅

从表2中可以看出，论文成果的创新性与效益是权重最大的指标，占到60%，突出了“创新”和“效益”的重要性，这也给高等教育学博士生毕业论文写作的关注点提供了指导方向。而选题与综述的质量、论文的理论基础与科研能力也都各占到20%，反映出一篇优秀的高等教育学博士论文要注重每一个要素，无论是宏观构架还是微观叙事，都必须尽善尽美，否则难称“优秀”之名。

三、改善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学术生态的政策建议

（一）扩大评选范围，增强学术生态多样性

生态多样性是指诸如物种、景观元和生态系统等丰富性和空间分布均一性的综合，生态多样性有助于生态环境保持平衡和稳定发展。学术生态环境亦如此，保持学术生态的多样性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同样至关重要。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任主席欧内斯特·博耶（Ernest Boyer）在其1990年发表的《学术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中提出的学术生态观就认为：高等教育系统的多样化能够促进学术的良性横向竞争和不同类型学校的和谐共生。可见，学术生态多样性是学科发展繁荣的重要表征和持久动力。

从历届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的分布来看，

论文作者主要集中于几所发达地区的重点院校教育系所的若干著名导师门下，西部地区院校与非重点院校罕见。这虽与各地区各校高等教育学科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也与中国高教学会“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的评选范围局限有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二级学科博士点16个（含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覆盖），教育经济与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39个（含2011年新增的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覆盖），每年出产的高等教育领域的博士论文应该

自动进入评选的范围，才

能逐步打破由某几所院校垄断的局面，从而增强高等教育学科的学术生态多样性。

（二）促进优秀博士生及导师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

是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基础。同样，学术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保持一个学科的学术生态持续稳定和发展的关键。人才的能动性、再生性、高增值性、动态性，表明人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资源”的基本属性与特殊属性。因此，人才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一般可以从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储备等几个基本方面进行分析。

高等教育学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及其导师作为高等教育学科的优秀人才，是该学科学术生态中的稀缺资源，具有能动性、再生性（如前文中所述的从“优博获得者”到“优博导师”）和高增值性。因此，必须要积极关注优秀博士生及导师的学术职业发展，将其纳入专门的学科人才库，长期跟踪和研究；高教学会组织及高等院校的相关院系也必须创造良好的学术条件与资源环境，使人才的学术潜力得到持续的开发。只有这样，才能保障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学术生态的长期平衡与稳定发展和有望未来培养出更多的高等教育学优秀学术人才。

（李威，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博士生，上海 200433）

（原文刊载于《现代教育管理》2015年第9期）

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与发展探析

迟景明 陈晓光

高等教育作为国家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持续动力之一，每年培养出数以百万计的各领域专业人才。高等教育学作为以高等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也已经培养了大量掌握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和具备独立科研能力的专门人才。其中，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位于学科人才培养的最高阶段，承载着更多知识发现与传承创新的任务。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对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运用科学计量学Citespace对我国1990年到2012年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应用信息可视化技术绘制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科学知识图谱，明晰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题知识结构及前沿问题，以对本学科未来研究方向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有一定的基础和借鉴作用。

一、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的基本情况

以检索词为“学科专业名称”=“高等教育学”进行检索，在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中国国家图书馆博士论文数据库中检索相关文献942篇（各数据库数量分布情况见图1）。在对检索文献去重之后，有效学位论文561篇，分布时间段为1990年到2012年（检索开始时间为2013年4月10日，截止时间为2013年5月26）。其中，1990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分别是厦门大学郭大光的《高等学校教学改革四十年的理论研究》和厦门大学王伟廉的《高等学校专业与课程改革的理论研究》，两位作者的指导教师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的鼻祖潘懋元教授，这两位作者也同年成为我国第一届高等教育学博士。1992年至1996年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产出较少，平均每年不足3篇。自1997年起，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出现明显的递增趋势，2007年和2008年均达到最大值58篇（具体文献分布情况见图2）。

在检索的文献中，以学位授予单位进行排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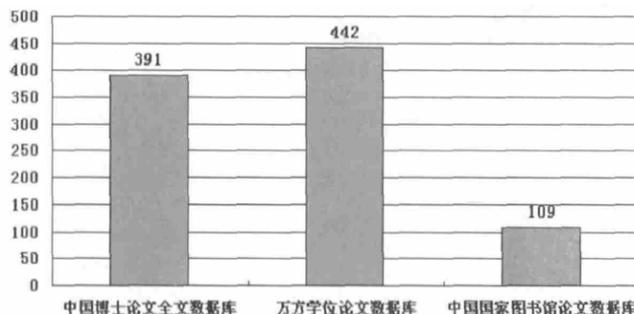


图1 数据库中博士学位论文数量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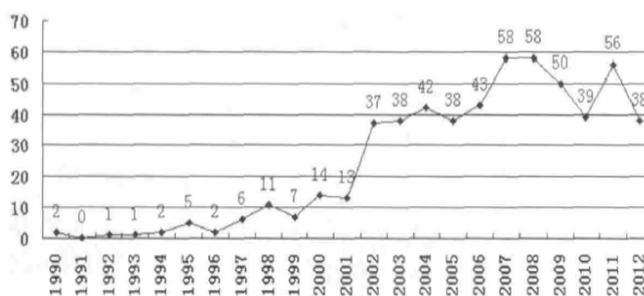


图2 文献数量的年份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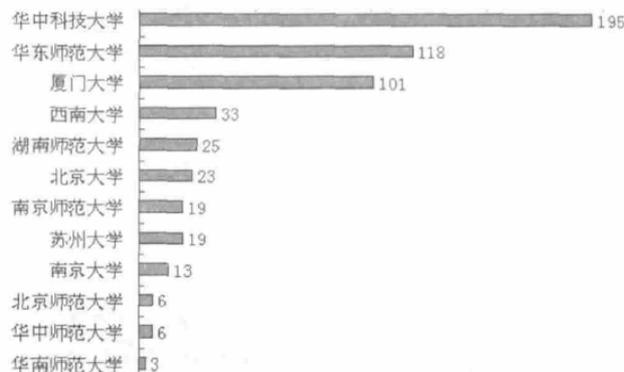


图3 博士学位论文产出机构统计

有12所大学出现在名列中（各单位产出数量见图3）。其中，华中科技大学以195篇名列首位，华东师范大学以118篇列第二位，厦门大学以101篇列第三位，西南大学33篇，湖南师范大学25篇，北京大学23篇，这三所高校分别名列第四、第五和第六位。文献数量前三位的高校总产出占全部文献的73.7%。从文献分布与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点分布地域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机构的地域分布仍然以华中、华东地区为主，培养单位较

为集中。

二、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分析

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可以清晰地展示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发展脉络，这一方法也是科学计量学和文献计量学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科学计量学是以科学知识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与结构关系进行探测，挖掘其中蕴含的内在规律。科学知识图谱以其直观动态图像信息来还原学科领域内的知识演进网络，并预测研究前沿，这也正是信息科学无可比拟的优势之一。

笔者运用Citespace软件分析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该软件是美国费城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开发的信息可视化应用软件，适用于多元、分时、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成为近年来在全美信息分析中最具特色和影响力的信息可视化软件。

（一）博士学位论文高频共现关键词分析

通过Citespace软件绘制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4）。从图谱上可以看到，关键词共现图谱出现了以“高等教育”、“大学”、“高等学校”、“中国”、“大学生”等为核心的关键词共现矩阵。其中，也形成了以“高等教育”、“大学”、“大学生”为核心的三个研究群组。这三个研究群组也是整个关键词

共现知识图谱中的核心群组。

从Citespace软件运行的结果来看，知识图谱中出现了凸显的关键节点信息，这为探测研究主题有进一步的指导作用（见表1和表2）。关键节点列表是出现频次在前20位的全部节点信息，表中频次（Frequency）、突现度（Burst）分别代表该关键词在所有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中出现的次数和该关键词在一段时间内递增的趋势。频次越高说明该关键词代表的研究范围越普遍，突现度越高说明此关键词短时期内越会迅速成为研究的关注点。为更准确地把握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的发展趋势，citespace将时间跨度分为两部分，分别是1990-2000年和2001-2012年，也就是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前11年和后12年。

在1990-2000年中，关键词“高等教育”和“中国高等教育”是突现度最高的两个关键词；而在2001-2012年中，关键词“高等教育”、“高等院校”、“中国”和“民办高等教育”成为突现度最高的前四位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在短时期内迅速成为研究的关注点，这与我国高等教育所取得的成就是分不开的，然而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隐含的突出问题亟需解决。

从表1和表2可以发现，在1990-2000年出现频次较多的节点主要有“高等教育”、“中国高等教育”、“大学”、“高等学校”、“中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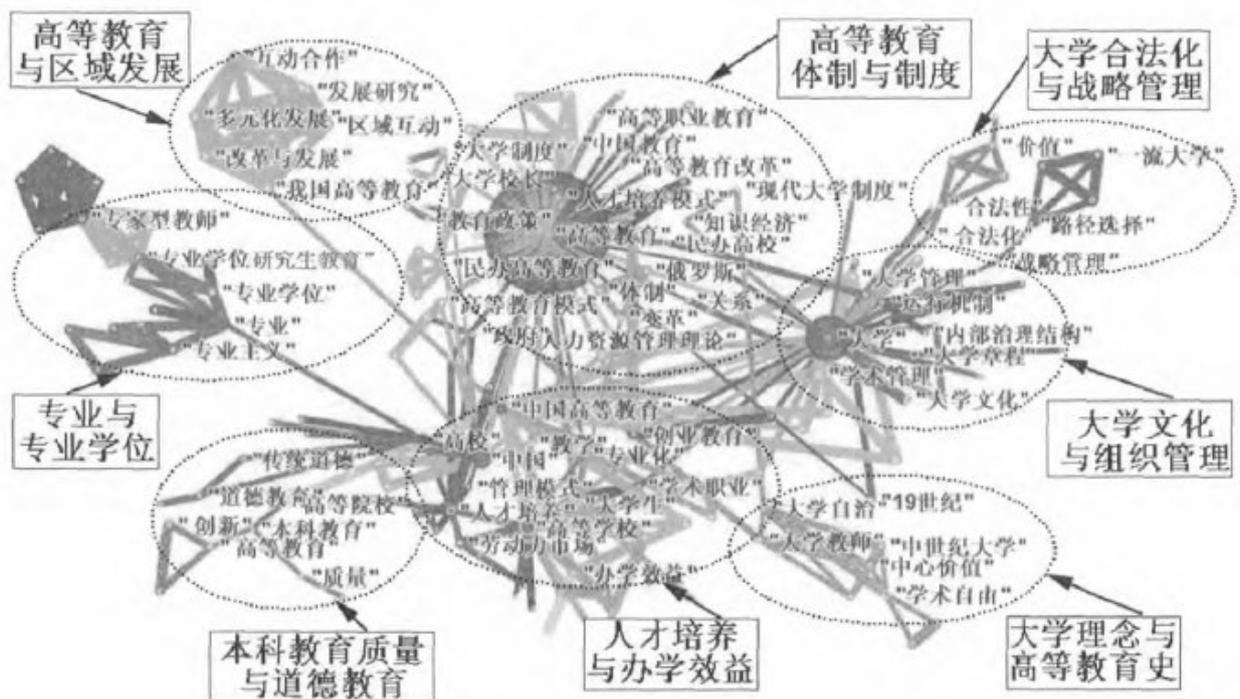


图4 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表1 1990-2000 年高频共现关键词列表

序号	频次	突现度	中介度	关键词	首现时间
1	18	5.24	0.03	高等教育	1993
2	7	3.35	0.02	中国高等教育	1995
3	6		0.03	大学	1995
4	5		0.02	高等学校	1995
5	4		0.02	中国	1998
6	4		0.03	中国教育	1995
7	3		0	办学效益	1994
8	2		0	高等教育理论	1992
9	2		0	教学改革	1990
10	2		0	师范教育	1995
11	2		0	教育质量	1999
12	2		0.02	办学自主权	1995
13	2		0	普通高等学校	1994
14	2		0	民办高等教育	2000
15	2		0	大学理念	2000
16	1		0	学术权力	1997
17	1		0	自学考试	1993
18	1		0	助学金	1998
19	1		0	企业家精神	2000
20	1		0	大学教育	2000

表2 2001-2012 年高频共现关键词列表

序号	频次	突现度	中介度	关键词	首现时间
1	73	3.02	0.3	高等教育	2001
2	35		0.18	大学	2001
3	15		0.07	高等学校	2002
4	11		0.19	人才培养	2006
5	11		0.01	大学生	2002
6	10	2.87	0	高等院校	2007
7	9		0.02	大学制度	2002
8	9	2.67	0.03	中国	2002
9	8		0	发展	2008
10	8		0	制度	2006
11	8		0.03	大学教师	2003
12	7		0.17	高校	2008
13	7	2.95	0.01	民办高校	2007
14	6		0	大学组织	2001
15	6		0	教师教育	2004
16	6		0	研究生教育	2003
17	6		0	大学发展	2003
18	6		0.01	学术自由	2003
19	5		0.01	大学校长	2001
20	5		0	政策分析	2006

国教育”等；在2001-2012年中出现频次较多的节点主要有“高等教育”、“大学”、“高等学校”、“人才培养”、“大学生”、“高等院校”和“大学制度”等。从前后两个阶段的总体情况来看，出现频次最多的是“高等教育”一词，达到91次，占所有关键词频次比率的11%，这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学始终以高等教育为着力点开展研究，对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而“大学”作为“高等学校”主要形式，其出现的频次也

达到41次，占所有关键词频次比率的4.9%，这表明我国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始终关注大学及其内部的课程与教学问题。“人才培养”、“大学制度”、“民办高校”、“大学教师”等关键词也具有较高的出现频次，说明“人才培养”、“大学制度”“大学教师”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中重要的研究群组。

除此之外，中介中心度（Centrality，简称中介度）也成为衡量高等教育研究趋势的重要尺度。中介度是反映关键词在知识图谱中的“中介”作用，也是连接不同研究群组的关键节点。在Citespace预设参数下，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有四个关键节点的中介度超过了0.1，分别是“高等教育（0.33）”、“大学（0.21）”、“人才培养（0.19）”和“高校（0.17）”，表明对高等教育理论及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状况的关注在高等教育学学科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

（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主题结构

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基础上进行聚类分析，可以得到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主题的知识结构。聚类结果显示出共有64个聚类，传递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涉及的领域繁多，成果鲜明。经过筛选聚合度和相关性较高的8类群组，并结合Citespace软件自身附带的Tf*Idf算法推荐的标签词，以及过去别敦荣、安心、杜志强等学者对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成果进行标识（见表3），总结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关注的热点问题，并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中予以标记。

从关键词共现的聚类结果来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关注的热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高等教育体制与制度；大学理念与高等教育史；本科教育质量与道德教育；人才培养与办学效益；大学文化与组织管理；高等教育与区域发展；大学合法性与战略管理；专业与专业学位。其中，从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维度上来看，大学文化与组织管理、大学合法性与战略管理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大部分选题来源于博士研究生对热点问题的敏锐察觉。1999年我国高等教育的大规模扩招，一方面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另一方面隐含着

表3 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关键词聚类分析的研究主题列表

聚类编号	共现频次	中心度	主要关键词	年份	研究关注热点	聚类编号	共现频次	中心度	主要关键词	年份	研究关注热点
25	91	0.28	高等教育	1993	高等教育 体制与制度	30	41	0.2	大学	1996	大学文化与 组织管理
25	8	0.01	民办高校	2007		30	4	0.01	大学章程	2012	
25	5	0.01	高等教育改革	2009		30	3	0.01	运行机制	2012	
25	4	0.01	中国教育	1995		30	4		大学文化	2006	
25	2		制度变革	2010		30	4		大学理念	2000	
25	2		全球化	2012		30	2		办学自主权	2000	
27	1		体制	2002		28	4		高等教育管理	1999	
21	3	0.01	管理模式	2011		28	1		学术管理	1997	
24	2	0.01	高等职业教育	2003		28	5		大学管理	1997	
20	4	0.01	现代大学制度	2003		37	4	0.05	我国高等教育	2000	
34	9	0.02	大学制度	2002		37	2		发展研究	2001	高等教育与 区域发展
34	1	0.01	大学校长	2001		37	1		区域互动	2001	
20	6	0.01	学术自由	2003		37	1		互动合作	2001	
20	2	0.01	大学自治	2003		大学理念与 高等教育史	33	2	0.02	合法性	2005
20	3		中世纪大学	2003	33		1		合法化	2005	
20	1		中心价值	2003	19		3	0.02	战略管理	2010	
35	5	0.03	本科教育	2005	19		2	0.02	路径选择	2010	
35	3	0.01	质量	2005	本科教育 质量与 道德教育	19	3		一流大学	2009	专业与 专业学位
35	1		创新	2005		17	4	0.1	专业	2006	
22	3	0.01	道德教育	2009		17	2	0.01	专业主义	2007	
22	1		传统道德	2009		17	2	0.01	专业学位	2006	
31	2		劳动力市场	2007	人才培养与 办学效益	17	1		专业认证	2008	
32	11	0.08	人才培养	2006		18	2	0.05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2001	
28	3	0.01	办学效益	1994		18	2	0.03	专家型教师	2001	
23	1		教育收益率	1998		17	1		专业知识	2011	

学生培养质量与就业的双重矛盾。近些年，就业难问题更为凸显，引起了诸多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对该问题的关注，“创业教育”、“课程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等关键词便是对此矛盾的回应。随着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点和博士数量的增加，博士学位论文选题趋向多元化，从宏观问题向微观问题拓展，从高校外部向高校内部延伸，“大学章程”、“大学制度”、“大学权力”、“大学文化”和“质量评估”等关键词逐渐出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中。

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培养经过了27年的历史，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方向也呈现多样化趋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研究主题集中于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管理、课程与教学论等领域；2000年以来，研究主题集中于人才培养、办学效益、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专业结构与经济发展、大学内部治理与组织管理等领域。2010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和“完善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以此为转折点，“大学章程”、“世界一流大学”、“院校自治”、“学术权力”等关键词引领了新的研究领域，也说

明了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迈入了从注重规模结构向注重内涵发展的关键时期。

三、对我国未来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建议

从1990—2012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的561篇博士学位论文的文献计量分析和信息可视化结果来看，这些学位论文较好地反映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知识基础，推动了研究主题的扩散，真正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全球教育国际化的进程中，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的培养也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与挑战，尤其体现在科研水平与学术质量上，博士学位论文恰恰是这一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博士学位论文搜集与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也存在一些问题，如选题创新性不足，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研究结合度不够等。为此，笔者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学科点和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提出几点建议。

（一）注重博士学位论文相关数据的收集

在搜集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数据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各个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授予点已经毕业博士生的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多则几百篇，少则几十篇。作为两大权威的论文数据库，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收录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

位论文有391篇（截至2013年5月26日），万方学位论文数据库有442篇（截至2013年5月26日），经过去重之后，实际得到的有效博士学位论文高达561篇。在如此数量繁多的论文中找到与自己博士学位论文相关的研究主题，这就要求未来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在论文数据收集方面要结合多个数据库，保证相关研究主题数据的全面和完整。同时，各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应继续加强博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和平台的建设，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提供更加便捷、有效的数据信息。

（二）注重理论研究 with 问题研究相结合

在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中，博士生应注重基础理论研究 with 问题研究相结合。20多年的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发展过程呈现出从注重基础理论研究到向问题研究转变，从高等教育史的研究、高等教育学学科研究、教学和课程等研究领域向高等教育体制与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质量与评价、人才培养和办学效益等研究领域转变。大多数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以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的热点问题为切入点，探索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对策，体现出了较强的实践性和前沿性，但问题研究不应以基础理论研究的缺失为代价。“比较研究”、“理念”、“价值”等表征理论研究的关键词较少出现。正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的不完备，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与学科建设的研究还需继续深化与提升。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从理论高度对高等教育改革与学科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进行分析，应注重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在探索高等教育学自身发展的同时，应结合我国的高等教育具体情况，用基础理论研究的成果去指导高等教育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从而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三）注重宏观研究 with 微观研究相结合

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应注重宏观问题与微观问题研究相结合。宏观问题体现在我国高等教育体制与结构、大学制度与管理等方面，并且占据很大的比例，从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特征。而对高等教育微观问题的研究却占了很小的比例，教学质量评估、学科评估、大学文化建设、大学治理等关键词成为了新形势下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代名词。高职教育、民办高等教育、民办高校、多校区管理

等关键词都是以数量扩充为主导特征的外延式发展，这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偏小，分析其原因是办学效益过低，当时为解决此问题，高等教育界提出了以扩充高校招生规模来提高生师比和高校规模效益。而高校扩招的后果就是高校出现难以适应的状况，此时，高等教育发展思路出现了由高校内部扩充挖潜向以新建高等学校的方式转变。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的关注点也自然出现了较大的转移，对职业技术教育和民办教育投入了更多的关注。新时期，我国高等教育注重内涵式发展提倡以质量提升为准则，强调建立一个适度、灵活的标准，这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提出了新的命题。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选题，在重视高等教育宏观问题研究的同时，不应忽视对大学微观问题的研究，而应特别处理好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

（四）加强对院校研究的关注

院校研究作为高等教育学新的研究领域，应该引起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的关注。我国的院校研究虽然只有十余年历史，但却是一个备受关注、有着广阔发展前景的研究领域。院校研究在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中的比例还很小，但其已经呈现出上升的态势。这是因为院校研究是以一所高校自身为研究对象，以定量研究为主要研究方法，解决高等教育运行中遇到的特定问题，提高院校管理和决策的科学化水平，促进高校快速发展。面对日益激烈的全球化高等教育竞争，高校内部管理乃至战略规划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我国院校研究的历史较短，理论和方法有待完善，因此更需要高等教育学博士生，特别是有着丰富高校教学和管理经验的研究者对院校研究投入更多的关注。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应在借鉴国外先进的院校研究的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我国高等院校的特殊性，实现我国院校研究的“本土化”，丰富院校研究案例，钻研于院校研究的专题研究，真正促进我国高等院校健康有序发展。

（迟景明，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辽宁大连 116024；陈晓光，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辽宁大连 116024）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12期）

我国高等教育学 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方法的特点及变化趋势 ——基于2005—2014年379篇博士论文的研究

童 星

对于任何一门学科而言，它的形成与发展都与这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研究方法也是每个教育研究者必须考虑的，它直接关系到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适用性。有学者指出，“方法的变化（包括研究者思想方法的变化和研究中使用具体方法的变化）是教育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个必要条件，研究越深入，对研究方法的要求也越高。”那么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状况如何？对此，不少学者运用文本分析法进行了调查研究，如徐辉、季诚钧对2000、2001年《高等教育研究》中的286篇期刊论文进行了分析，丁学芳和周燕以近30年来人大复印资料《高等教育》中所登载的论文为文本，分析了30年来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演进历程。这些研究能够帮助我们加深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现状的认识。

一个学科的博士学位论文是该学科呈现其前沿性研究的重要途径，对高等教育博士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调查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某个侧面认识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使用状况。田虎伟在2005年对2000—2004年度研究高等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中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调查分析，然而最近十年却没有相关研究，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不断向前发展，研究方法使用状况也应有变化。故笔者对2005—2014年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分析，这有助于了解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使用现状和变化趋势，同时也利于高等教育学位论文中研究方法的改善，提高我国高等教育学位论文水平。

一、研究方法与研究过程

1. 文本来源与抽取。2015年2月5日笔者从中国知网的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学科名称为高等教育学搜索从2005—2014年近十年的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一共检索到286篇相关论文。

2. 研究方法的分类。事实上，学术界对于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标准。本研究采

用潘懋元先生在其著作《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具体分类方法及含义见表1。

表1 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分类

方法论	具体方法	含义	
定性研究	思辨研究方法	语义分析方法	对概念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
		历史研究方法	通过还原历史的真实寻找历史对今天的启示
		比较研究方法	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在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点和差异进行比较
		文献研究法	对重点文献进行确定，研究变化过程进行逻辑梳理
	质性研究方法	民族志研究	了解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的文化意义
		叙述研究与口述史	通过故事叙述的形式来揭示研究对象的内在世界
		行动研究	以改善行动者的行动为中心目的
		扎根理论研究	通过对研究对象的长期观察，发挥其主导性的影响因素，发挥研究对象的思考模式和行为模式，从而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个案研究	以特定对象的事件为研究对象并提出参考性咨询性的意见
		文本分析	以文本的整体意义理解为基础，不歪曲作者的意见
定量研究	实验研究	控制了至少一个变量，把研究单元随机分配给所控制的变量的不同水平或类别	
	准实验研究	被试没有被随机分配	
	调查研究	探讨自然情境下社会心理变量之间关系的事后追溯研究，对现状的分析	

3. 资料的统计与分析。一般来说，博士论文中对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作了专门的阐述，但是也有些论文并未明确提出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因此要找出研究方法需要仔细阅读和判断。阅读286篇博士学位论文，首先从论文方法论层面判定属于定性还是定量维度进行统计，对于归类于定性的论文，再判断它属于思辨研究还是质性研究，进而确定其具体的研究方法。对于归类于定量的论文，再判断它是否运用了实验法、准实验法或调查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博士论文的研究方法多数超过1种，笔者在计算时把每种研究方法出现1次计为1频次，因此，研究方法使用的总频次大于研究论文的篇数。

二、研究结果的呈现

笔者首先对近十年这13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横向比较反映出各个研究方法使用的多寡。而后在方法论层面通过纵向的历史比较，发现定性论文和定量论文内部各个研究方法使用的走势与变化。通过横向和纵向的分析，

力求展示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研究方法的运用状况。

1. 近十年各具体研究方法使用的整体情况。根据本文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分类，高等教育总共有13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笔者对每篇论文所使用的具体的研究方法逐年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从2005年到2014年各具体研究方法的使用频率，具体见表2。

表2 近十年各研究方法使用的整体情况

具体方法	使用篇数	所占比例(%)
语义分析方法	274	95.80
历史研究方法	103	36.01
比较研究方法	160	55.94
文献研究法	268	93.71
民族志研究	26	9.09
叙述研究	66	23.08
行动研究	6	2.10
扎根理论研究	13	4.55
个案研究	101	35.31
文本分析	44	15.38
实验研究	5	1.75
准实验研究	1	0.35
调查研究	124	43.36
总计	286	

由表2我们可以看出近十年使用最多的研究方法是语义分析法，总共286篇论文中有274篇用到了语义分析方法，其次有268篇用到了文献研究法，二者使用比例均达到了90%以上，因为一般博士论文写作都会对概念做语义分析和进行文献梳理。使用最少的则是准实验和实验，这可能与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使用难度较大有关。总的看来，除了调查研究，使用最普遍的是思辨性质的研究方法，其他研究方法使用偏少。

2. 近十年方法论层面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走势。笔者对每篇论文在方法论层面属于定性还是定量逐年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从2005年到2014年两种方法论使用的情况与走势，具体结果见图1。

由图1看出近十年定性研究依然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主旋律，每年定性研究占有所有研究的比例均在80%以上，定量研究比例最高的年份也只有17.5%。从历史的走势来看这十年定性类研究有所减少，定量研究所占比例在上升，但上升幅度较小。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层面还是以定性为主。

3. 近十年定性研究中思辨与质性研究的走势。定性研究又分为思辨研究和质性研究，笔者对定性研究类每篇论文中使用了思辨方法或者质性方法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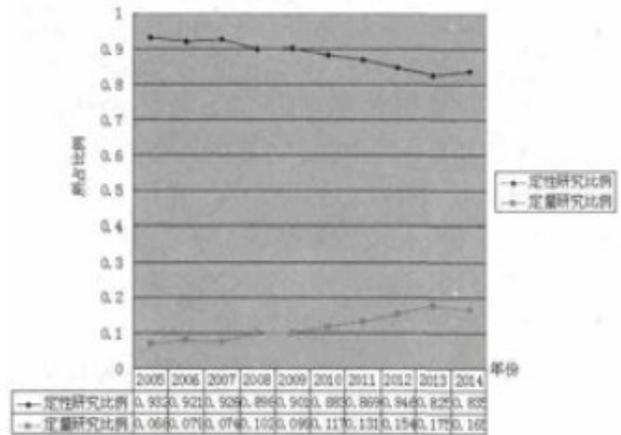


图1 近十年定性与定量研究所占比例的变化趋势

究逐年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从2005年到2014年二者的使用的总体情况与走势，具体结果见图2。从图2我们可以更细致地看出近十年定性研究中最主要的依然是思辨研究，思辨研究占比最低的年份也达到了63.9%。然而，从近十年走势来看质性研究增幅较快，在其占比最高的年份甚至达到了36.1%。由此看来，质性研究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与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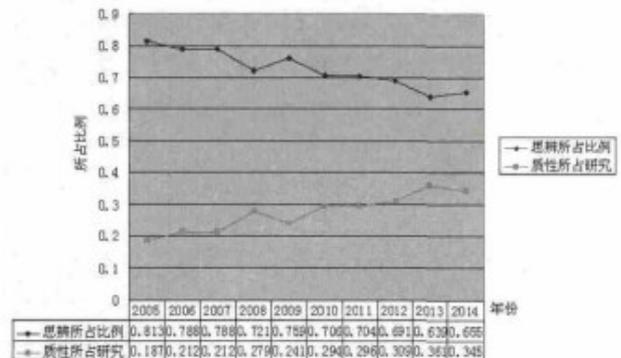


图2 近十年定性研究中思辨与质性研究方法所占比例的变化趋势

4. 近十年定量研究中三种研究方法的走势。定量研究中具体研究方法又可以分为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和调查研究。笔者对定量研究类论文使用的实验、准实验或者调查研究逐年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从2005年到2014年三个研究方法使用的总体情况与走势，具体结果见图3。

从图3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近十年定量研究中最主要的仍然是调查研究，实验和准实验研究非常之少，在有些年份几乎没有被采用。

三、近十年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特点和不足

通过统计结果的呈现可看出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不断趋向完善，比如说实证类研究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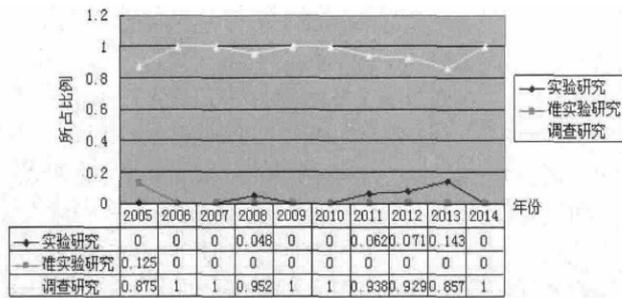


图3 近十年定量研究中三种研究方法所占比例的变化趋势

定程度的增加，质性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同时，我们亦可发觉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中存在的一些不足。总的来说，近十年来高等教育研究方法呈现以下3个特点与不足。

1. 思辨类研究仍占大多数，实证类研究偏少。

由图1可以看出，近十年尽管定量类研究在增多，但增加幅度有限，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方法论层面仍然以定性研究为主。对表1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思辨研究在定性类研究中占了主要部分。如果从另一个侧面进行分类，依据“无论量还是质的研究，一般都被统称为实证或经验研究，其研究结论总是要诉诸经验方可获得与验证。”我们把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统称为实证研究，可以发现近十年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思辨类研究仍占大多数，实证类研究偏少。思辨研究的特点是以概念或理论为起点通过逻辑推理、层层演绎到另一个理论或概念，是一种书斋式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能帮助厘清高等教育学中的诸多概念内涵及其之间关系，构建理论体系，明确高等教育价值取向等，因此，思辨研究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十分重要。但是，任何研究方法都有其适用的定义域和局限性，思辨研究也不例外。首先，思辨研究往往忽略现存的客观教育事实，论文往往是研究者主观经验的总结或逻辑推导，这导致其研究结论带有较大的主观性，主观色彩导致其研究结论往往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证伪，因而不具有重复性和可验证性，这就使得思辨研究缺乏科学性。再者，思辨研究结论往往只是阐明了教育的应然状态，却无法提供具体实现方法，在高等教育的具体实践中操作性低，对于解决高等教育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略显无力。而实证研究则是研究者运用适当的研究技术对研究对象进行大量社会调查，收集相关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实证研究的长处恰恰能弥补定性研究与思辨研究的短处。事实上，自19世纪

30年代到70年代孔德等人提出“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标准模式建立统一的知识体系，并由此开创了实证主义社会学研究传统，且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主流。”目前国外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实证研究是最基本和普遍的。思辨与实证研究二者应该是旗鼓相当、齐头并进、相辅相成的，但遗憾的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实证研究仍然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

2. 质性研究逐渐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尽管目前高等教育领域实证类研究偏少，但让人感到欣喜的是实证研究在慢慢增多，尤其是质性研究呈现出较快增加的情况。著名学者邓金和林肯对质性研究所作的经典性的定义是：“在研究对象的实地背景下，试图对人们赋予意义的现象做出理解和阐释。”我国学者陈向明对质性研究的定义为：“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的整体性探究，从原始资料中形成结论和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质性研究的兴起与量化研究本身的局限性是密不可分的。研究者愈加发现：“在将复杂的教育现象归结为量的过程中，人们必须对其进行控制和简化，以便按量化的标准去揭示变量之间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被舍弃的是教育现象中一些无法用变量之间的关系说明的因素和信息。”质性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由陈向明等学者陆续介绍进入我国，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慢慢意识到质性研究的价值，在高等教育领域，质性研究亦同样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提倡。有研究者指出质性研究对于高等教育的特殊价值，“质性研究方法为高等教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获取新的资料、发现高等教育实践中的新问题”。正由于质性研究本身的优点，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研究者采用此方法也是顺理成章的。

3. 研究方法总体还较为单一，定量研究数据有待深入挖掘。通过对每年博士论文文本的比较，笔者发现高等教育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一些以前不常用的研究方法逐渐被研究者采纳。如2009年王春春在其博士论文《美国精英文理学院研究——对麦克莱斯特学院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中使用了典型的民族志研究，李锦奇2010年在他的毕业论文《区域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研究——以辽宁省为例》中采用了行动研究，2013年于汝霜在博士论文《高校教师跨学科交往研究》中很严格地使用了扎根研究。与

之前相比，研究者们采用了更加多样的研究方法，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使用呈现多点开花的趋势。从表1我们可以发现目前大多数研究还是采用思辨方法，少有的质性研究主要还是集中于个案调查，定量的研究更是以调查研究为主，实验和准实验研究几乎没有，因而总的来看研究方法还是比较单一的。同时笔者发现，大多数的调查研究论文的数据分析只是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当然并非每篇论文都需要进行推断性统计，如果通过描述性统计就能说明问题亦可。但不少论文完全可以不局限于使用百分数统计、频数分布或者平均数等描述性统计，如能采用诸如相关分析、方差分析或者回归分析等更高级的推断性统计可得出更多研究结论，从而达到对数据更充分的利用与挖掘。即使在为数不多的推断性统计中，比较常见的是相关分析、方差分析等，对数学要求更高的多层线性模型、多变量分析的使用十分少。有研究者就指出“从定量研究的角度来讲，现代数学迟迟未被引进到教育科学中来。”事实上，在其他诸如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量化研究中，使用高级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的情况已经十分普遍，并且已经开始使用复杂的数学建模进行数据分析，相比之下，高等教育领域中开展数据分析的量化研究有待深入。

四、建议与对策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近十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在研究方法上取得了不小的进步，许多新的研究方法被运用在研究中。但是，高等教育研究方法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据此提出3点建议与对策。

1. 提倡实证研究，加强定量研究中的数据分析水平。2001年，美国研究报告《教育的科学研究》强调通过实证研究增强教育研究的科学性，这本书指出：“实证证据是对研究结果的不同解释进行正确排除（鉴别）的基础，也是得出合理推论从而积累新知识的基础。”目前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定量与实证类研究十分普遍，高等教育学界亦然。我国高等教育学的发展需要思辨研究为我们厘清基本概念，提出价值追求。但同样需要大量的实证类研究深入细致地研究高等教育的实然状况，并据此提出有效的建议与对策，从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更科学的发展。在提倡实证类研究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完善实证研究的资料分析方法，尤其是量化研究中可使用更加复杂的数理统计方法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从而能发现更多的高等教育规律和结

论。

2. 改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的现状，提倡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目前我国教育研究方法的使用还比较单一，诸如民族志、扎根理论、行动研究和实验研究还十分稀少。事实上，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不是万能的，每种研究方法都有局限性。同时每种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的优势，研究者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问题选择最合适的研究方法。并且，同一个研究问题可以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相应的研究结果之间可以相互验证。更为重要的是，各种研究方法的结合能提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这些年国外出现了定性和定量研究之外的混合研究方法，它被称作“第三种教育研究范式”“第三次方法论运动”。在这之前的单一方法论或纯粹论的阵营相信：“由于哲学基础和范式不同，同一研究只能使用单一方法范式进行。”混合研究摒弃了非此即彼的单线思维，强调在同一研究中以问题为中心，综合使用多种技术方法，力求对研究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有学者指出：“许多研究问题和综合性问题最好是通过混合研究的方式来解决。”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问题往往较为复杂，混合研究的使用能提高其研究的效度。

3. 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研究，提高研究者的方法运用能力。有研究者就指出：“多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界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探索还很不够，对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缺乏深刻的认识，以致高等教育研究实践中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盛行。”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一门科学，需要专门的理论研究。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研究会加深我们对不同研究方法的认识，有助于研究者揭示高等教育现象的本质和规律，提升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品质，推进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除了加强高等教育研究方法的理论研究，还要注意提高教育研究者的方法运用能力，不能只限于纸上谈兵。一方面要注意培养研究者面对具体高等教育研究问题时选择合适研究方法的能力，另一方面要培养研究者具体方法的熟练使用能力，研究者实际运用方法能力的提高才能保证有更优秀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

（童星，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062）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9期）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相关因素分析

——兼论其布局的均衡性

李硕豪 李文平

1978年5月，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机构——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成立，这是高等教育研究在中国成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的重要标志。1981年，厦门大学招收了中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将高等教育学正式列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1984年以潘懋元主编的《高等教育学》的正式出版为标志，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正式建立。1984年、1986年，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点和博士点相继在厦门大学建立。经过近30年发展，我国已建立了高等教育学硕士点96个，从绝对数量来看，各大区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分布的确存有较大差异，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各大区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结构和布局存在明显差异，高等教育学的学位点的地域分布存在着严重的不均衡。但是，这些论述一定程度上尚停留在主观判断和思辨性阐述上，缺乏实证分析和探讨，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数据只停留在描述性统计，忽略了变量之间的隐含关系。因而，对已有数据的深层次分析，找出影响高等教育学学位点数量的相关因素及其之间的关系，验证高教学位点布局是否均衡，探讨学位点理论分布模型，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文献综述

尽管我国研究者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过学位点布局的均衡性问题，但理论上、学术上对其深入研究的文献却不多见。利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分别检索主题词：学位点布局、学位点分布、学位点区位、学位点结构，来源时间：1999—2012年，来源类别：全部期刊，检索条件：精确，分别检索到文章3篇、1篇、0篇、0篇。鉴于检索效果较差，笔者进行了扩大性检索，检索主题词：学位点，来源时间：1999-2012年，来源类别：全部期刊，检索条件：精确，共检索到文献37

篇。

根据检索获得的文献来看，有研究者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布局区域之间不均衡，区域内部的布局也不均衡，这种不均衡影响着优势地区高等教育学科水平的持续提升，使劣势地区的高等教育学科无法适应本地区现代大学建设的要求，使高层次的高等教育专业人才得不到有效利用，还会影响到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和谐发展。有研究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大部分集中于华北、华东和华中这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但是学位点的分布不可能绝对均衡，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这种布局的不均衡性，在探讨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布局的过程中应考虑客观条件和人口分布的状况。还有研究者基于区域发展的研究，提出我国研究型大学区域间布局不均衡，区域内部布局也不均衡。此外，王军运用计量学的方法，对我国高等院校博士学位授权点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我国博士学位授权点的布局区域之间不均衡，总体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协调。林伟连在分析我国学科点与学位授予单位的总体规模与发展态势、区域分布特点的基础上，认为我国的学位点的分布区域之间不均，区域内部则十分聚集，而且博士学科点的分布比硕士学科点的分布更加聚集。刘荣才从我国职业教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点布局出发进行了探讨，得出的结论是职业教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点的布局不平衡，职业教育硕士学位点设置相对较多，而博士学位点凤毛麟角。

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对数据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按照各大区拥有学位点的绝对数量占全国的百分比情况，从而得出目前的学位点布局不均衡。然而应该看到，这些说法只是基于主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缺乏科学的统计分析来深入探究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所得结论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鉴于此，笔者根据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获得高等

教育学硕士点分布数据，基于潘懋元先生指出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分布的因素，进行了变量可操作化筛选，利用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给相应变量赋值，对其进行编码录入SPSS19.0，依次使用pearson相关系数、总体分布卡方检验、LSD方差检验、多元回归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影响我国教育学硕士点分布的各变量之间的深层关系。

二、研究设计

1. 变量筛选和数据来源。潘懋元先生认为影

响我国高等教育分布的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基于变量的可操作性考虑，我们筛选出了有可能影响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六个主要变量：“高等学校数量”、“GDP”、“教育支出”、“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和“区域总人口”。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在硕士专业目录下，检索专业名称：高等教育学，检索时间2012年12月27号，获得96个检索结果，据此统计出各地区相关数据。利用中国统计年鉴网获得《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据此对影响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相关变量进行赋值。

2. 技术路线。本研究的技术路线由六步构成。第一，对所有变量进行编码，录入SPSS19.0；第二，自变量与因变量相关性分析；第三，数据清理，清除与因变量相关性较低的变量；第四，验证因变量是否符合最终期望分布；第五，提出假设并利用LSD法验证各大区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分布是否有显著差异；第六，构建线性回归模型。

三、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相关情况介绍

1.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基本情况。由表1可知，我国目前共有高等教育学硕士点96个，其中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分别有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3个、11个、33个、13个、6个、8个、12个，各占全国份额的13.5%、11.5%、34.4%、13.5%、6.3%、8.3%、12.5%。从以上数据来看华东、华北、华中这三个地区共有59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占全国的61.4%，这样按绝

对数值和百分比重来看，似乎这三个地区所占的比重过大，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布局很不均衡，但这种布局均衡与否尚需要我们对相关数据做深入挖掘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此外，各大区的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区域总人口的具体数值也如表1所列，限于篇幅，这里不做展开。

表1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基本情况

地区	地区生产总值(元)	教育支出(元)	高等学校数量(所)	在校本科生人数(人)	高校教职工人数(人)	区域总人口(人)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个)
华北	776724000000	228699000000	387	1894589	369022	146702200	13(13.5%)
东北	4537753000000	123774000000	255	1538637	232468	109664100	11(11.5%)
华东	19055031000000	488765000000	764	4081257	663899	395226967	33(34.4%)
华中	6623285000000	188613000000	374	2122849	340132	217411000	13(13.5%)
华南	6745381000000	181203000000	225	1214960	191131	160271888	6(6.3%)
西南	4623884000000	194103000000	273	1564914	231328	193718200	8(8.3%)
西北	2791537000000	144672000000	205	1079371	176839	97231200	12(12.5%)

注：1.华东：沪、鲁、苏、皖、赣、浙、闽；华南：粤、桂、琼；华北：京、津、冀、晋、蒙；华中：豫、鄂、湘；西北：陕、甘、宁、新、青；东北：黑、吉、辽；西南：渝、川、黔、云、藏。2.表格数据是根据《2011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2.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期望分布。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现状不是由某单一因素使然，而是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区域人口所占全国的比重等因素长时期综合作用下的产物。鉴此我们将以上变量进行单位化操作，首先对各大区相关变量的绝对数值进行排序，其次将绝对数值最小的地区视为单位1，再次把其他地区的数值按照单位1进行折算，最后按照这六个变量折算出单一因素作用下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应符合的期望分布值（见表2）。

表2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期望分布

变量	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
GDP的比值	2.782:1.625:6.825:2.372:2.416:1.656:1
教育支出的比值	1.847:1:3.948:1.523:1.464:1.568:1.168
高校数量的比值	1.887:1.243:3.726:1.824:1.097:1.331:1
在校本科生的比值	1.755:1.425:3.784:1.966:1.125:1.449:1
高校教职工人数的比值	2.086:1.314:3.754:1.923:1.080:1.308:1
区域人口的比值	1.508:1.127:4.064:2.236:1.648:1.992:1

但是只进行单一变量期望分布的验证，会忽视变量间的交互作用，难免产生误差。故在对变量进行单位化操作的基础上（表2获得的数据），笔者将获得的单一因素期望分布值进行综合。第一，对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所占全国的比重的比值，按照其权重

进行赋值（由于在下文的验证中证实区域人口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布局不共线，故对其进行了数据清理），例如按照各大区GDP占全国的权重进行赋值，华北2.8、东北1.6、华东6.8、华中2.4、华南2.4、西南1.7、西北1。第二，将各大区按前五个变量赋值所获得的数值进行累加，结果为华北10.4、东北6.6、华东22.1、华中9.6、华南7.2、西南7.4、西北5.2。第三，计算各大

表3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分布与各变量的简单相关系数矩阵

		GDP	教育支出	高校数量	在校本科生	高校教职工	区域人口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
GDP	Pearson 相关性	1	0.958**	0.844**	0.871**	0.838**	0.842**	0.584**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N	31	31	31	31	31	31	31
教育支出	Pearson 相关性	0.958**	1	0.869**	0.883**	0.853**	0.909**	0.555**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1
	N	31	31	31	31	31	31	31
高校数量	Pearson 相关性	0.844**	0.869**	1	0.962**	0.933**	0.879**	0.678**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	31	31	31	31	31	31	31
在校本科生	Pearson 相关性	0.871**	0.883**	0.962**	1	0.962**	0.879**	0.732**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	31	31	31	31	31	31	31
高校教职工	Pearson 相关性	0.838**	0.853**	0.933**	0.962**	1	0.790**	0.790**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N	31	31	31	31	31	31	31
区域人口	Pearson 相关性	0.842**	0.909**	0.879**	0.879**	0.790**	1	0.393*
	显著性(双侧)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29
	N	31	31	31	31	31	31	31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	Pearson 相关性	0.584**	0.555**	0.678**	0.732**	0.790**	0.393*	1
	显著性(双侧)	0.001	0.001	0.000	0.000	0.000	0.029	
	N	31	31	31	31	31	31	31

区的加权平均数，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的加权平均数分别为2.08、1.32、4.42、1.92、1.44、1.48、1.04。第四，将获得的加权平均数进行百分化处理，得出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所占全国的比重的综合影响下，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占全国的份额分别为15.1%、9.6%、33.26%、14.01%、10.51%、10.8%、7.59%。第五，得出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最终期望分布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0.151:0.096:0.333:0.140:0.105:0.108:0.076。

四、研究结果

1.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相关因素分析。本文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相关性分析指的是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与相关因子的一种线性相关统计关系，笔者采用相关系数矩阵分析探讨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与其他变量的关系。

由表3可知，当显著性水平 α 为0.01时，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与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的简单相关系数r分别为0.584、0.555、0.678、0.732、0.790，

它们之间的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都近似为0。因此应拒绝零假设，认为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与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区域人口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相关系数检验的概率p值为0.029大于0.01，故接受零假设，认为区域人口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之间不存在线性关系。

从上文数据可知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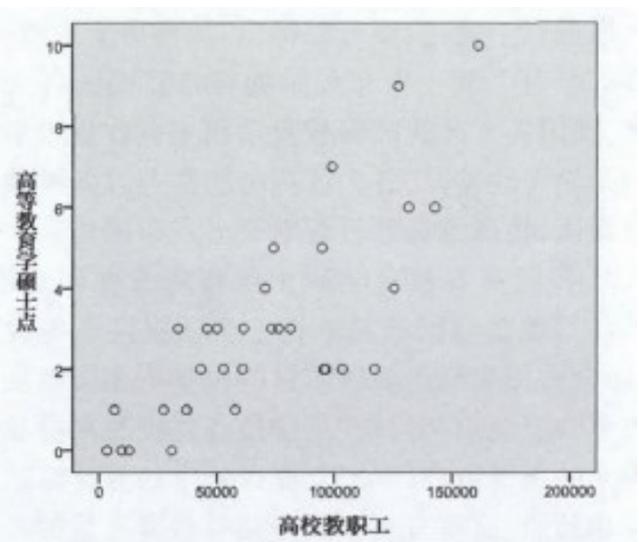


图1 高校教职工人数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的散点图

与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都具有较强的正向共线性；与区域人口不共线，故对其做数据清理处理。即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分布数量会随着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的增减而同增同减，但其增减的程度由回归系数 b 决定。例如，从表3来看，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与高校教职工的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 r 达到了0.79，是相关系数中最大的一个。在图1中反映为，在高校教职工人数与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所建立的坐标系中，这两个变量构建的点密集分布于直线周围，说明这两个变量的线性拟合优度较高，我们可以使用线性关系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进行预测和检验。由于pearson相关系数从本质上反映的是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并非pearson相关系数越高，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影响程度越大，故若要判定高校教职工人数的变动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影响的程度（每增加一个单位的高校教职工人数，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相应增加多少个），我们还需对其回归系数 b 进行测算。回归系数 b 在图1中反映为拟合直线的斜率 k ，正向关系中回归系数 b 越大，直线的斜率 k 也就越大，高校教职工人数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影响作用越明显。

有学者指出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也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所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只有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才会产生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的需求，以期用其更好地指导高等教育的发展，两者具一种因果关系，故我们可以利用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进行衡量和预测。同样，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也会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所需求，进而刺激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进而传递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这些在文中反映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与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具有正向共线性。我们可以用衡量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重要指标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用衡量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GDP和教育支出，利用线性关系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进行

衡量和预测。此外，现代社会交通、通信手段的高度发达，使得人口的流动性迅速提升；区域高校的生源也不仅局限于本区域，而是面向全国；网络课程、虚拟大学的兴起更大程度打破了学生的地域限制，这些都使得区域人口对本区域高等教育的影响越发减小。由此它也恰当地解释了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建设与区域人口不存在线性关系。

2.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合理性。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自身发展要考虑多种因素，不能片面追求数量上的平均，而要遵循“合理布局，突出特色”的原则。如果现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符合当前各大区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共同影响下所占全国的份额，那么就可以认为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合理。

笔者选取总体分布的卡方检验来对上面的假设进行验证。总体分布的卡方检验是用来验证总体与期望分布或某一理论分布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是一种吻合性检验，通常适用于对有多项分类值的总体分布的分析。本文的总体是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在各大区的分布数量，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13：11：33：13：6：8：12，验证所需的最终期望分布为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0.151:0.096:0.333:0.140:0.105:0.108:0.076。

假设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分布与各大区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综合作用下所占全国的比重0.151:0.096:0.333:0.140:0.105:0.108:0.076无显著差异。

表4(a)表明，96个观察数据中，华东、华南、华北、华中、西北、东北、西南实际分布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个数分别为33个、6个、13个、13个、12个、11个、8个；按照期望分布，96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在以上七大区的期望分布数量应为31.7个、10.0个、14.4个、13.3个、7.2个、9.1个、10.9个；实际观察频数与期望分布频数的差分别为1.3个、-4.0个、-1.4个、-0.3个、4.8个、1.9个、-2.3个。

表4 (a) 地区

	观察数	期望数	残差
华东	33	31.7	1.3
华南	6	10.0	-4.0
华北	13	14.4	-1.4
华中	13	13.3	-0.3
西北	12	7.2	4.8
东北	11	9.1	1.9
西南	8	10.3	-2.3
总数	96		

表 4 (b) 检验统计量

地区	
卡方	5.817*
df	6
渐近显著性	0.444
a. 0 个单元 (0.0%) 具有小于 5 的期望频率, 单元最小期望频率为 7.2。	

表5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多重比较检验

(I)大区	(J)大区	均值差 (I-J)	标准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华北	东北	-1.067	1.779	0.554	-4.74	2.60
	华东	-2.114	1.426	0.151	-5.06	0.83
	华中	-1.733	1.779	0.340	-5.40	1.94
	华南	0.600	1.779	0.739	-3.07	4.27
	西南	1.200	1.540	0.444	-1.98	4.38
东北	西北	0.200	1.540	0.898	-2.98	3.38
	华东	-1.048	1.681	0.539	-4.52	2.42
	华中	-0.667	1.989	0.740	-4.77	3.44
	华南	1.667	1.989	0.410	-2.44	5.77
	西南	2.267	1.779	0.215	-1.40	5.94
华东	西北	1.267	1.779	0.483	-2.40	4.94
	华中	0.381	1.681	0.823	-3.09	3.85
	华南	2.714	1.681	0.119	-0.75	6.18
	西南	3.314*	1.426	0.029	0.37	6.26
	西北	2.314	1.426	0.118	-0.63	5.26
华中	华南	2.333	1.989	0.252	-1.77	6.44
	西南	2.933	1.779	0.112	-0.74	6.60
	西北	1.933	1.779	0.288	-1.74	5.60
	西南	0.600	1.779	0.739	-3.07	4.27
	西北	-0.400	1.779	0.824	-4.07	3.27
西南	西北	-1.000	1.540	0.522	-4.18	2.18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表4 (b) 是计算的卡方统计量以及相对应的概率P值。由于概率P值为0.444大于显著性水平 $\alpha=0.05$, 因此无法拒绝零假设, 认为当前各大区分布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无显著差异, 其布局符合我国各大区在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综合作用下所占全国的比重。

据以上统计检验得出的结果可以说, 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与各大区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综合作用下产生的期望分布无显著差异, 其布局符合各大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 即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是合理的。基于这个结论笔者做出进一步推论: 各大区拥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之间无显著差异, 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均衡。

3.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均衡性。为了检验上文所提出的推论是否真实, 笔者选取最小显著性差异LSD法。LSD法是用来检验控制变量不同水平下观测变量水平间的均值是否相等的一种检验方法。其检验敏感性很高, 水平间的均值只要存在一定程度的微小差异就可能被检验出来。本文中, 控制变量指的是七个不同的大区, 观测变量指的是各大区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即用LSD法来验证我国七个大区所拥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水平间的均值有无显著差异 (H_0 假设)。

表5显示了不同大区之间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水平均值检验的结果。表5中第一列显示了分类情况, 第二列表示各区之间均值的差异情况, 第三列是统计中的标准误差, 第四列是检验统计量观测值在不同分布中的概率P值, 最后一列是置信水平区间的取值范围。通过观察不同分类水平下的P值, 我们可以发现除了华东地区与西南地区配对时, 其概

率P值为0.029, 小于显著性水平0.05以外, 其他配对比较获得的概率P值均大于0.05, 这说明除了华东与西南这两个地区进行配对比较时出现了差异之外, 华北、东北、华中、华南、西北这五个地区之间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均值都没有显著性差异, 华东与华北、东北、华中、华南、西北这六个地区的高等教

育学硕士点数量均值也无显著差异, 西南与华北、东北、华中、华南、西北这六个地区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均值同样也没有显著性的差异。

根据以上验证, 便可以得出: 从整体上来看, 当前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结构符合我国的各大区的现状, 我国各大区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水平均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 各大区拥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均衡, 我国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均衡。

4.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线性回归模型。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根本在于全面提高高等教

育质量，而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根本则在于解决好高等教育的宏观构架问题。学位点建设是高等教育宏观构架的重要组成部分，若能以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测算和预测，这将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与GDP、教育支出、高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都具正向共线性。据此，我们便可拟合出多元回归方程。假设变量GDP为X1，教育支出为X2，高校数量为X3，在校本科生人数为X4，高校教职工人数为X5，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为Y，可建立如下的线性回归模型：

$Y = \beta + aX_1 + bX_2 + cX_3 + dX_4 + eX_5$ ，其中 β 为常数。

表6 (a)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R	R 方	调整 R 方	标准估计的误差
1	0.834 ^a	0.695	0.634	1.514

a. 预测变量:(常量),高校教职工,GDP,高校数量,教育支出,在校本科生。

依据表6 (a) 可知，模型调整判定系数为0.634，大于0.5且趋近于1，认为方程能够有效地进行拟合，因变量能够被模型有效地解释的部分较多。

表6 (b)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F 检验^b

模型		平方和	df	均方	F	Sig.
1	回归	130.551	5	26.110	11.388	0.000 ^a
	残差	57.320	25	2.293		
	总计	187.871	30			

a. 预测变量:(常量),高校教职工,GDP,高校数量,教育支出,在校本科生。b. 因变量:高等教育学硕士点

从表6 (b) 可知，被解释变量的总离差平方和为187.871，F检验统计量的观测值为11.388，对应的概率P值近似为0。据该表可进行回归方程的显著性检验。由于概率P值小于显著性水平 α (0.05)，应拒绝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的零假设，认为各回归系数不同时为零，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全体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建立线性回归模

型。

表6 (c) 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系数		t	Sig.
		B	标准误差	试用版		
1	(常量)	0.189	0.779		0.974	0.339
	GDP	2.212 E-13	0.000	0.323	3.877	0.001
	教育支出	1.0086 E-11	0.000	-0.687	3.592	0.001
	高校数量	0.0084	0.026	-0.317	4.970	0.000
	在校本科生	1.4338 E-6	0.000	0.191	5.790	0.000
	高校教职工	9.382E-6	0.000	1.217	6.947	0.000

a. 因变量:高等教育学硕士点

从表6 (c) 的数据表明，模型保留下的五个变量，其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的概率p值均小于显著性水平 α (0.05)，因此认为模型保留下的各回归系数均不为零。最终的回归方程是： $Y = 0.189 + 0.0000000000002212X_1 + 0.000000000010086X_2 + 0.0084X_3 + 0.0000014338X_4 + 0.000009382X_5$ 。若要测算某区域理论上应分布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只需使用当年的统计数值对变量进行赋值、计算便可获得理论值。以华北为例，依据该模型对该地区2011年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进行检验，得出华北地区 $Y = 13.6431$ ，与实际值13十分接近，说明2011年华北地区布局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合理，符合理论期望。若要预测某年某区域理论上应分布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则需基于其他模型一一预测出未来某年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的数值，代入回归方程计算得出。

由该模型可知，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随着GDP、教育支出、高等学校数量、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教职工人数的增减而同增同减，其增减的程度可由模型中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判定，在正向关系中回归系数越大，变量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的影响程度就越大。从回归系数来看，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影响效果最显著的是高校数量（其回归系数为0.0084），然后依次是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教育支出和GDP（其回归系数分别为0.000009382、0.0000014338、0.000000000010086、0.0000000000002212）。即高等学校每增加1所，高校教职工人数每增加1人，在校本科生人数每增加1人，教育支出每增加1元，GDP每增加1元，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会相应

增加0.197个、0.189009382个、0.1890014338个、0.189000000010086个和0.1890000000002212个。

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是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衡量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指标一般包括高等学校数、在校学生数、招生数、毕业生数、教职工数和专任教师数以及毛入学率等。本文中，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的影响因素中作用效果最明显的是高校数量，然后是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教育支出和GDP。直观上看，可以说高等学校数量越多，相应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也就越多。因为一般来讲，高等学校数量越多，相应的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就会越多，学科门类、学科建设水平也会更多更好，产生优秀大学机率也会更大，这样就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使得高等教育的发展程度更高，获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也就会更多。而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需要依托具体的高校才能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产生影响，故其作用效果不如高校数量那样强。例如，极端情况下，某区域的高校教职工和在校本科生全都聚集于一所学校，那该区域也只会获批一个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只有高校教职工和在校本科生分布在许多高校内，使得许多高校达到了学位点的建设水平，该区域才能拥有较多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此外，作为社会经济发展衡量指标的教育支出和GDP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数量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效果。高等教育学学位点是在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发展有所需求的情况下产生的，社会经济因素通过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进而传递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正是这种传递作用使得教育支出和GDP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的影响效果不如以上三个变量。相比教育支出，GDP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影响更为间接，其作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通过教育支出特别是高等教育支出影响高等教育的经费，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二是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影响高校的专业设置、毕业生去向、招生人数、学科的冷热等方面，间接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

虽然高校数量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具有较强的影响作用，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

数、教育支出和GDP对其也具有一定的影响效果，但并不能只片面强调某一因素的作用。高校数量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作用离不开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的影响；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影响需依托具体高校；高等学校数量的增加，教师、学生数量的增加又需要资金的支撑；GDP和教育支出只有通过影响高等教育才能传递作用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的建设。这都说明各变量只有相互共同作用才能更好地对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产生影响。

五、结论

多年来，有许多学者对高等教育学硕士点的布局进行了探讨，他们或基于描述统计分析，或基于学理性思辨分析，都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布局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会影响优势地区高等教育学科水平的持续提升，使劣势地区的高等教育学科无法适应本地区现代大学建设的要求，使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学专业人才得不到有效利用，还会影响到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和谐发展。但是，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以主观判断和思辨法为主，所得结论缺乏科学的检验，势必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臆断，造成研究结果的失真。

笔者运用统计学原理和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的相关因素以及其布局的合理性、均衡性进行了探讨，发现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与高校教职工人数、在校本科生人数、高校数量、GDP、教育支出显著相关；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布局符合各大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其布局是合理的；我国各大区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水平均值之间无显著性差异，各大区拥有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数量均衡。此外，笔者在最后还给出了某区域理论上应分布的高等教育学硕士点个数的预测模型，方便以后更深层次的研究。

（李硕豪，兰州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教授，甘肃兰州 730000；李文平，兰州大学经济学院经济与管理专业研究生，甘肃兰州 730000）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3年第6期）

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选拔问题研究

——基于中国15所院校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的分析

王运来 全守杰 陈滔娜

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的研究，一般着重探讨培养模式、培养制度、培养结果与就业分布等。如有研究对高等教育学博士的成长与贡献、中美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培养模式、中美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培养制度等进行探讨，然而缺乏对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选拔问题的专门研究。由于博士研究生选拔的方式决定了“谁”可以进入博士生培养阶段，因此探讨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选拔问题对深化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生教育改革和推动相关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本研究通过分析2013年我国招收高等教育学专业的15所院校，探讨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选拔问题。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986年，厦门大学首开我国高等教育学博士点。高等教育学在学科定位上“是教育学一级学科门类中的一个二级学科，它的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教育学、发展与教育心理学、教育经济与管理”。本研究对厦门大学等15所院校(详见表1)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的高等教育学专业(代码:040106)招生情况(仅限公开/普通招考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统计分析的数据均来自这15所大学的研究生院网站。

表1 15所院校名称及其类型

院校类型	院校名称
“985工程”院校	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
“211工程”院校	南京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苏州大学
非重点院校	西北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由表1可知，招收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15所院校中，“985工程”院校7所，占46.67%；“211工程”院校6所，占40%。重点院校（“985工程”和“211工程”）占绝大多数(比例为86.67%)；非重点院校仅2所(比例为13.33%)。按照师范与非师范院校划分，师范院校共8所，非师范院校共7所，这两类院校数量相当。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有的院校具有教育学一级博士点，但在

2013年招生目录中无高等教育学专业(代码:040106)博士研究生招考信息，故不在本研究统计范围之内。在搜集了表1所列15所院校的招生信息后，从院校区域分布、招生方向类别、导师数量、业务课考试科目和外语考试科目等方面进行整理分析。

二、数据描述与统计分析

(一) 院校区域分布

梳理和分析招收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院校区域分布情况，对研究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招生具有积极的意义。

表2 2013年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院校的区域分布

所在地区	招生院校数量	占招生院校总数的比例	院校所在省(直辖市)	该省(直辖市)招生院校数量
东部	10	66.67%	江苏	3
			北京	2
			上海	2
			浙江	1
			福建	1
			广东	1
中部	3	20%	湖北	2
			湖南	1
西部	2	13.33%	重庆	1
			甘肃	1

由表2可知，2013年招收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院校在全国的区域分布是不均匀的。东部11省市(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天津、河北、辽宁、山东、海南)中有6个省份10所院校招生。中部8省(湖北、湖南、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中有2个省份3所院校招生。西部12省区(重庆、甘肃、四川、贵州、云南、广西、陕西、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内蒙古)中有2个省份2所院校招生。东部招生的省份和院校数量最多，中部次之，西部最少。这表明，招收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的院校主要集中在东部发达地区，特别是北京、上海、江苏等地，以及中部较为发达的湖北、湖南两省。这与国内相近的专业“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存在相似的问题。招收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的高校大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而西部地区多个省区仅有1所高校招

收该专业博士生，体现出西部地区该专业培养水平相对滞后。在三大区域中，省份最多的西部可能由于该区域的经济水平和发展教育的整体水平相对滞后，故而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招生的院校数量最少。

(二) 招生方向类别

表3 8所及以上院校设置的招生方向

招生方向类别	院校数量	院校名称
高等教育管理	13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苏州大学
		西南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西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原理	8	华中科技大学
		厦门大学
		南京大学
		西南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湖南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表4 2-7 所院校开设的招生方向

招生方向类别	院校数量	院校名称
比较高等教育	7	北京大学
		南京大学
		浙江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苏州大学
		西南大学
大学课程与教学	3	南京大学
		厦门大学
		苏州大学
高等教育与社会	3	华中师范大学
		厦门大学
高等教育发展研究	3	南京师范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史	2	苏州大学
		南京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评估	2	华东师范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
中外合作办学与高等教育国际化	2	厦门大学
		华南师范大学

招生方向反映一个专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热点。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招生方向体现的是目前高等教育研究中国内主要学者所关注的重要课题和研究热点。有8所及以上院校设置的招生方向情况见表3，有2-7所院校设置的招生方向情况见表4。

从表3和表4可以发现，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方向中，高等教育管理是多数院校开设的方向，开设院校达到13所。有超过半数（8所）院校开设高等教育原理方向。有2-7所院校分别开

设比较高等教育、大学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与社会、高等教育发展研究、高等教育史、高等教育评估、中外合作办学与高等教育国际化等招生方向。另有考试研究、高等职业教育、大学文化研究、高等教育原理与方法、高等学校德育、高等教育法、高等工程教育、学术政策与管理、高等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领导等10个研究方向在6所不同的院校中开设。厦门大学为开设相关方向最多的大学，达到8个；其次是苏州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开设方向为5个。部分院校开设招生方向较少，仅为2个。综上可知，高等教育管理与高等教育原理是多数院校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招生方向，而这些方向也是当前高等教育研究中稳定、成熟和热点的方向；厦门大学、苏州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为开设相关方向相对较多的3所院校。

(三) 导师数量

一个专业的导师数量是衡量该专业师资水平、学科（专业）实力的重要指标。经过整理，2013年各院校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招生导师情况如表5（北京大学的招生导师数量数据不详）。

表5 2013年各院校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招生导师数量排序

院校名称	导师数量	排序
厦门大学	11	1
苏州大学	10	2
西南大学	8	3
华中科技大学	6	4
湖南师范大学	6	
北京师范大学	5	6
南京大学	4	7
华东师范大学	4	
上海师范大学	3	9
南京师范大学	2	10
华中师范大学	2	
华南师范大学	2	
西北师范大学	2	
浙江大学	1	14

由表5可以看到，厦门大学的招生导师数量最多，达到11人。苏州大学的招生导师数量次之，为10人。西南大学的招生导师为8人，位列第三。南京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的招生导师人数均为2人，浙江大学的招生导师仅为1人。这表明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导师数量以4-6人的院校居多，导师队伍雄厚的多为非师范院校，师范院校的导师队伍相对薄弱。实际上这与院校特色密切相关，特别是在部分师范院校中，可能由于在教育学一级学科下开设了多个博士点。虽然博士生导师队伍庞大，但具体到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导师数量就相对少了。相应地，这些师范院

校由于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招生导师相对较少，培养高等教育研究人才的能力也相对较弱。

(四) 业务课考试科目

博士研究生招生业务课考试科目的设置，旨在考查报考者的专业素养和在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发展潜能，从中选拔优秀者，从而达到“择优”的目的。根据对14所院校（北京师范大学考试科目数据不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科目的数据整理，将业务课考试科目的设置方式分为三类：按照大综合与专业方向设置考试科目（见表6），按照小综合与专业方向设置考试科目（见表7）和按照两门重要课程设置考试科目（见表8）。

表6 按照大综合与专业方向设置考试科目的院校

院校名称	大综合科目	专业方向科目
北京大学	教育学与教育史	比较高等教育 教育政策基础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理论综合	高等教育学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一)	高等教育管理
浙江大学	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西北师范大学	教育原理	高等教育学
西南大学	教育研究方法	高等教育学
厦门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素质	高等教育理论

表7 按照小综合与专业方向设置考试科目的院校

院校名称	小综合科目	专业方向科目
华南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学原理	比较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管理学
苏州大学	高等教育学原理	高等教育历史与比较 高等教育心理学
南京大学	高等教育理论与方法	高等学校改革与发展
南京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学原理	高等教育的历史与比较

表8 按照两门重要课程设置考试科目的院校

院校名称	科目一	科目二
华中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管理
华东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管理学
上海师范大学	高等教育学	高等教育管理

综合表6、表7和表8可以看出：招生考试科目按照大综合与专业方向设置考试科目的院校数量最多，达到7所；按照小综合与专业方向设置考试科目的院校数量次之，为4所；按照两门重要课程设置考试科目的院校数量最少，为3所。不同的科目设置方式反映出不同的考试要求。按照两门重要课程设置考试科目——其一，要求考生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功底；其二，这两门课程所体现的往往是该院校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重要研究领域。按照小综合与专业方向相结合设置考试科目，在于考查报考者高等教育学综合的理论知识、方法掌握等基础，

并对某一专业方向有较为深入的了解和研究。由于“大综合”科目不仅考查报考者的高等教育学理论基础，而且还考查其是否掌握教育学甚至人文社会科学等相关理论、方法，因此更为注重考查报考者是否具备宽广的教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综上所述可知，大多数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院校将进行报考者的综合素养与专业方向的理论功底结合起来。

(五) 外语考试科目设置

表9 按照专业方向设置外语考试科目数量排序

院校名称	可选语种(总)	排序
南京大学	英、俄、日、德	1
北京大学	英、德	2
华东师范大学	英、日	

表10 不分专业方向设置外语考试科目数量排序

院校名称	可选语种(总)	排序
湖南师范大学	英、俄、日、德	1
华中师范大学	英、俄、日	2
南京师范大学	英、俄、日	
西北师范大学	英、俄、日	
厦门大学	英、俄、日	
西南大学	英、日、德	7
华中科技大学	英、日	
苏州大学	英、日	
上海师范大学	英、俄	10
浙江大学	英	
华南师范大学	英	

博士研究生招生外语考试科目的设置，旨在考查报考者的外语水平。由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于世界知识系统之外”，研究人员的外语水平对于开拓研究的国际视野、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连接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分析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招考中的外语考试科目情况是很有必要的。本研究搜集的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中，外语考试科目设置方式可分为两类：按照专业方向设置外语考试科目（见表9）和不分专业方向设置外语考试科目（见表10）。

由表9和表10可以发现，按照专业方向设置外语考试科目数量最多的是南京大学，可选语种为英、俄、日、德；其次是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可选语种分别为英、德和英、日。不分专业方向设置外语考试科目数量最多的是湖南师范大学，达到4种；华中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和西南大学的可选语种为3种。浙江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的外语考试科目仅限于英语。除了所有院校都有英语语种可选之外，其余各

语种可选情况为日语, 10所院校可选; 俄语, 7所院校可选; 德语, 4所院校可选。综上可知, 除了少数(3所)“985工程”院校按照专业方向设置外语考试之外, 多数院校(11所)倾向于不分专业方向设置外语考试科目。而某一院校不分专业方向设置外语考试科目不能等同于该校可选语种丰富。如设置俄语语种招考科目的院校数量比设置德语语种招考科目的院校数量稍多, 然而根据对《高等教育研究》(武汉)、《中国高等教育》(北京)、《中国高教研究》(北京)、《现代大学教育》(长沙)、《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北京)等国内重要期刊(均为CSSCI来源期刊)2011年至2013年刊登的文章进行查阅的结果来看, 有不少关于德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 却几乎未见有关俄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成果。

三、讨论与建议

第一, 招生院校的区域分布不均。从总体上看, 华东地区在各类学位授予单位数和各类学位授权点数方面遥遥领先, 西南和西北地区则相对偏少。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院校存在着东部很多、中部较多、西部很少的状况。西部地区具有发展研究生教育的基本条件和接纳高层次人才迫切要求, 但由于地域和经济差异等因素, 造成西部地区人才流失严重、补充困难。西部招生院校过少, 不利于培养更加适合开展当地高等教育研究的高级人才。特别关于区域性的特色研究领域, 如果由当地的院校及其培养的博士研究生承担和开展研究将更有助于发掘新领域、产出新成果。因此, 可以通过西部地区院校的博士点设置来进行适当调整。如西部地区有的师范院校已经获得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 相关院校可以根据地区和院校实际, 有针对性地设置高等教育学博士点, 招收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第二, 招生方向设置有待优化。全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向总数达到19个, 有的院校招生方向达到5个以上。在有导师队伍保障的前提下, 合理设置多个招生方向有助于高等教育不同领域研究工作的开展。然而, 部分院校的专业招生方向有重复开设之嫌, 如高等教育管理与高等学校管理、高等教育领导等可视为相同研究方向, 即设置高等教育管理方向即可。此外, 部分招生方向过少的院校可以通过调整导师队伍, 有针对性地增设招生方向, 力争设置至少3个以上相对稳定的主要

研究方向。因此, 有必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高等教育博士研究生招生方向, 从而提高招生方向设置的科学性。

第三, 导师数量参差不齐。在15所招生院校中, 导师人数最多的达到11人, 导师人数少的只有1人。并且, 招生导师为2人的院校(均为师范院校)达到4所, 招生导师仅为1人的院校1所。这表明部分院校(特别是师范院校)存在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队伍薄弱的现象。导师队伍薄弱不仅影响招生方向的开设, 而且还影响到高等教育研究人才的培养。相关院校在已有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内可根据专业设置情况合理调整导师队伍结构, 适当增加高等教育学博士点的导师数量。这对于保障高等教育学专业导师队伍稳定性, 形成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是非常重要的。

第四, 考试科目设置差异较大。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研究生招生中, 业务课考试科目的设置方式差异较大, 要求不一。设置什么样的考试科目应根据各院校实际情况而定。总的来说, 大综合与专业方向综合的考试科目设置方式以及小综合与专业方向结合的考试科目设置方式体现了对报考者两个方面基础的考查: 较为宽广的理论素养和较为精深的专业素养。在外语语种的选择上无论是根据不同的招生方向设置还是不分专业方向设置, 都应该给予报考者更多的选择机会。虽然有的语种在在所院校中可选, 但是与该语种相对应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却不一定成正比。

综上所述, 我国上述15所院校所在区域分布不均、招生方向存在部分重复设置等问题。其中, 区域分布问题属于博士点的宏观布局问题, 这既需要院校自身加强队伍建设和学术积累, 也需要相关部门和院校共同协商来解决; 招生方向、导师队伍结构等问题属于院校统筹设计的问题, 相关院校可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进行调整、改革。

(王运来,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教授, 江苏南京 210093; 全守杰,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富乐敦分校教育学院访问学者, 江苏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讲师, 美国加州 928312; 陈滔娜, 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江苏南京 210098)

(原文刊载于《教育与教学研究》2014年第11期)

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群体特征研究

李明忠 褚照锋 邵攀 魏丽颖 张菊

随着厦门大学分别于1981年、1986年建立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和博士点，以及1983年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二级学科列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学科专业目录，高等教育学正式获得合法性学科建制，学位点建设和专业研究生培养步入正轨。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博学位点建设成效显著。据学者统计，目前全国有各类高等教育研究机构近1300所，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02个、博士点35个，有力推动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和专业人才培养，高等教育学从教育学科中的“后学”一跃成为“显学”。同时，必须看到我国高等教育学还存在学科发展迅速但时间不长、学位点快速增长但学科并不成熟、招生规模大但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和深入开展高等教育研究与学位点建设、专业人才培养紧密相关，研究队伍尤其是导师队伍是至关重要的核心要素，在硕博学位点和人才培养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导师队伍的规模、专业素养、指导能力等能否及时跟进并提供保障？本研究以导师队伍的基本情况为切入点，通过详细数据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博学位点导师队伍的群体特征，深入了解学位点建设和导师队伍质量状况，进而从导师队伍建设角度提出有效策略来进一步规范高等教育学专业学位点建设，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一、数据搜集与分析维度

1. 数据搜集

本研究的数据主要由各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官方网站取得。笔者逐一查询拥有硕博学位点的高校，共搜集到122个高等教育学硕士点、22个博士点（包括招收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生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14个）的有关数据。其中，临沂大学与山东师范大学虽联合招生，但单独培养，笔者将其作为两个硕士学位点分别统计。高等教育学硕博学位点的区域

分布如图1所示。

本研究所有数据资料的采集时间为2015年10-11月份。由于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第二军医大学、解放军工程大学等5个硕士点在2015年和2016年未招生，因此未统计这5所高校的导师信息。笔者详细搜索了117个学位点（22个博士点同时也是硕士点）所属高校的相关网页信息，搜集学位点的基本信息和研究生导师的详细信息。由于部分学位点网页内容简单、更新滞后，致使搜集到的学位点介绍信息和导师数量信息与实际不完全一致。为此，笔者一方面结合部分期刊论文中的作者简介以及中国知网硕博论文指导教师的相关信息进行补充和纠正；另一方面，根据部分导师年龄过大、去世、已调离原单位等情况，对统计的导师进行了初步筛选。^① 本研究共采集到834位导师信息，其中硕导645人、博导189人。^② 最终的导师数据信息虽与实际情况可能有一定出入，但相差不大，能够反映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及研究生导师群体的基本情况，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2. 分析维度

本研究旨在系统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导师队伍的群体特征，主要从学位点所属高校类型、导师梯队建设、导师性别差异和导师专业化程度等四个维度进行分析。

（1）学位点所属高校类型。为更好区分拥有高等教育学学位点高校之间的差异，本研究从高校层次和高校类型两方面把学位点所属高校划分为“985工程”高校、“211工程”高校、地方高校等3个层次和综合类、师范类、理工类、民族类、语言类、农业类、军事类等7个类型。高校类型主要反映两方面情况：其一，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高校对高等教育研究和学位点建设的重视程度，进而展现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其二，高等教育学与教育学之间的关系，部分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并非基于教育学一级学科而建设，由此反映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的独特研究对象和发展逻辑。

（2）学位点导师梯队建设情况。导师队伍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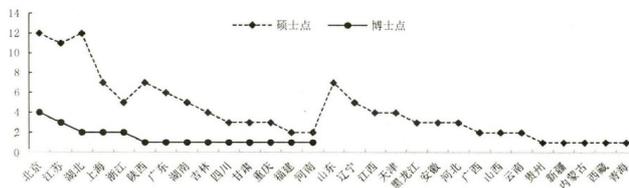


图1 我国高等教育学硕博学位点的区域分布情况

量合适、职称结构合理、年龄层次分布均衡是理想的导师梯队特征。因此，导师梯队规模、质量及结构是分析高等教育学学位点整体实力和水平的重要方面。本研究主要从导师规模、年龄、职称等三方面进行分析，把导师规模分为1-3人、4-5人、6-10人、11-15人、16人及以上等5个层次；导师年龄划分为35岁及以下、36-40岁、41-45岁、46-50岁、51-55岁、56-60岁、61岁及以上等7个阶段；导师职称分为教授（研究员）、副教授（副研究员）、讲师（助理研究员）等三级。

(3) 学位点导师性别特征。已有研究认为，现有学术领域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等级结构，女性学者人数少、成就弱、地位低。高等教育学是女性学者偏好和集中的研究领域之一，女性导师在高等教育学导师群体中的现状如何？了解高等教育学女性导师的基本情况以及男女导师之间的差异，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女性导师在高等教育研究以及研究生培养中的学术表现和话语权。

(4) 学位点导师专业化程度。教育水平及学科背景、专兼职比例、是否具有行政职务是分析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专业化程度的主要方面。一方面，教育水平和学科背景是一个人素质、知识和能力的重要体现，经过硕士生尤其是博士生阶段严格的知识学习和科研训练，对其学术发展和职业规划具有重要影响；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的研究领域，一定比例作为导师或兼职人员的经验丰富的行政管理 人员是高等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笔者根据搜集到的专兼职导师的行政职务信息，将其划分为五类：高校校级领导、高校二级学院（系、所）长、高校行政部门处级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处级及以上领导、科研机构处级及以上领导，有处级以下职务的导师未统计在内。

二、数据分析

我国117个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及其导师队伍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通过对117个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及其导师队伍情况的数据分析，发现学位点及导师群体呈现四个方面的显著特征。

1. 学位点分布不均衡

为了更好地呈现学位点的建设与发展情况，在分析学位点分布情况时亦包括了前述未招生的5所高校的学位点，所以共是122所高校。

第一，学位点区域分布广泛但不均衡。高等教育学的122个硕士点遍布29个省份，22个博士点分

布在14个省份，但区域布局并不均衡。一方面，学位点主要集中在中东部高等教育实力强且高校数量较多的省份。如图1所示，北京（12个）、湖北（12个）、江苏（11个）、上海（7个）、陕西（7个）、山东（7个）、广东（6个）、浙江（5个）、辽宁（5个）等省市学位点数量排名靠前，其中，北京、江苏和湖北三省的硕士点合计占全国的28.69%、博士点占40.91%。另一方面，贵州、新疆、青海、西藏、内蒙古等高等教育实力薄弱省份不仅各只有1个硕士点，而且是近几年才获批准的，处于起步阶段；宁夏、海南两省则尚无硕士点。

表1 我国117个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及其导师队伍的基本情况

学位点	硕士点		博士点		合计		
	N	%	N	%	N	%	
数量	95	100	22	100	117	100	
高校类型	"985工程"高校	22	23.16	9	40.91	31	26.49
	"211工程"高校 地方高校	17 56	17.89 58.95	8 5	36.36 22.73	25 61	21.27 52.14
导师规模 (人)	1-3	26	27.37	3	13.64	29	24.79
	4-5	14	14.73	4	18.18	18	15.38
	6-10	38	40.00	7	31.81	45	38.46
	11-15	15	15.79	5	22.73	20	17.09
≥16	2	2.11	3	13.64	5	4.28	
导师性别	男	427	67.67	149	73.40	576	69.06
	女	204	32.33	54	26.60	258	30.94
导师年龄(岁) (N=829)	<35	28	4.47	8	3.96	36	4.34
	36-40	65	10.27	20	9.90	85	10.25
	41-45	130	17.54	33	16.34	143	17.25
	46-50	185	26.32	38	18.81	203	24.49
	51-55	155	24.72	51	25.25	206	24.85
	56-60	69	11.00	34	16.83	103	12.43
≥61	35	5.58	18	8.91	53	6.39	
导师职称	教授	284	60.86	138	67.88	522	62.29
	副教授	227	35.97	61	30.05	288	34.53
	讲师	20	3.17	4	1.97	24	2.88
导师专兼职	专职	359	55.94	170	83.74	529	62.71
	兼职	278	44.06	33	16.26	311	37.29
导师职务 (N=394)	高校校级领导	81	24.32	16	26.23	97	24.62
	高校二级学院(系、所)长	124	37.24	7	11.48	131	33.25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	97	29.13	32	52.46	129	32.74
	科研机构领导	21	6.31	1	1.64	22	5.58
	社会科研机构领导	10	3.00	5	8.19	15	3.81
导师学历	博士研究生	433	66.30	180	88.67	613	73.28
	硕士研究生	98	15.53	10	4.93	108	12.95
	本科及其他	102	16.17	13	6.40	115	13.79
导师博士学位 学科背景 (N=595)	教育学	252	60.43	143	80.33	395	66.39
	管理学	86	20.62	14	7.87	100	16.81
	法学	19	4.56	5	2.81	24	4.03
	数学	17	4.07	10	5.62	27	4.54
	工学	16	3.84	2	1.12	18	3.03
	经济学	12	2.88	0	0	12	2.02
	理学	8	1.92	0	0	8	1.34
	历史学	4	0.96	3	1.69	7	1.17
	医学	3	0.72	1	0.56	4	0.67
	文学	3	0.72	1	0.56	4	0.67

第二，学位点所属高校的类型与层次分布不均衡。如图2所示，从高校层次来看，“985工程”高校32所，占39所“985工程”高校的82.05%，占122个学位点的26.23%；“211工程”高校59所（包括32所“985工程”高校），占112所“211工程”高校的52.68%，占学位点总数的48.36%；地方高校63所，占学位点总数的51.64%。由此可知，大多数“985工程”高校和超过一半的“211工程”高校均设有高等教育学学位点，且以理工类高校和综合类高校为主，充分反映了高层次高校对高等教育学研究和学位点建设的重视；与之相比，拥有学位点的地方高校比例虽高达51.64%，但主要集中于师范类院校（33所），与“985工程”、

“211工程”高校具有不同的学科建设路径和发展逻辑。从高校类型来看，师范类高校42所，占34.43%；综合类高校39所，占31.97%；理工类高校32所，占26.23%；其他还有民族类高校3所，军事类高校3所，农业类高校2，语言类高校1所。高等教育学学位点所属高校虽类型多样，但主要集中于师范、综合和理工三类，占比高达92.63%。学位点在师范、综合和理工三类高校中也存在分布不均现象，综合类高校中以地方高校和“985工程”高校为主，占比分别为46.15%和35.90%；理工类高校中以“985工程”和“211工程”高校为主，比例分别为43.75%和37.50%，师范类高校中以地方高校为主，占比高达78.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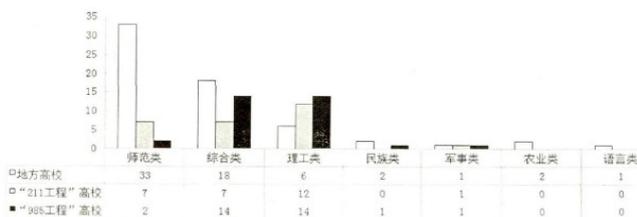


图2 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所属高校类型与层次的分布情况

第三，博士点与硕士点的分布存在一定差异。22个博士学位点分布于师范（13所）、综合（6所）和理工（3所）等三类高校，占比分别为59.09%、27.27%、13.64%；与之相比，122个硕士点在三类高校的分布比例分别为34.43%、31.97%、26.23%。与硕士点占比相比，师范类高校拥有博士点比例大幅上升，理工类高校拥有博士点比例则大幅下降，综合类高校基本持平，这反映了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与硕士点具有不同的建设路径，博士点分布与教育学一级学科传统优势紧密相关，硕士点分布则与高等教育研究重视程度高度相关。

第四，学位点培养人才的就业分布和影响力有显著差异。834名导师中有博士学位的为611人，其中学科背景明确的共595人，占比高达71.34%。对595名导师博士学位获得院校的统计发现：一方面，学科实力雄厚、具有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乃至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院校对高等教育学导师的培养具有重要影响。如表2所示，华中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其博士生培养的数量、质量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整体实力与分布格局。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培养人才的就业分布面和影响力具有显著差异，具有高等教育学国家重点学科的厦门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在全国具有广泛辐射性和影

响力，其他院校则具有一定区域影响力。具体来说，大连理工大学（22.22%）、东北师范大学（20.37%）、北京师范大学（11.11%）和吉林大学（11.11%）在东北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北京师范大学（25.00%）、北京大学（14.29%）在华北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华东师范大学（21.83%）、厦门大学（15.23%）、南京师范大学（7.61%）、浙江大学（6.60%）依次在华东地区具有较强影响；厦门大学（33.33%）和华中科技大学（33.33%）在华南地区的影响突出；华中科技大学（45.37%）、华中师范大学（9.26%）在华中地区的影响极大；西南大学（21.95%）、华中科技大学（21.95%）在西南地区的影响较明显；华中科技大学（28.95%）、西北工业大学（10.53%）、厦门大学（7.89%）、北京师范大学（7.89%）和西安交通大学（7.89%）在西北地区的影响较大。

表2 595名研究生导师博士学位授予院校排名前12位的情况

序号	学校	数量	硕导	博导	分布院校数	分布省份数
1	华中科技大学	101	73	28	51	21
2	厦门大学	61	38	23	36	21
3	华东师范大学	61	43	18	36	17
4	北京师范大学	57	43	14	36	20
5	北京大学	23	15	8	13	7
6	南京师范大学	20	15	5	5	4
7	浙江大学	15	8	7	9	6
8	华中师范大学	13	12	1	11	5
9	东北师范大学	13	13	0	8	4
10	大连理工大学	13	10	3	5	2
11	西南大学	10	7	3	7	5
12	南京大学	9	6	3	6	5

2. 导师梯队建设不合理

第一，导师队伍规模不合理。117个学位点共有导师834人，平均每个学位点约为7人，较为合理，但导师队伍规模并不均衡。如表3所示，导师队伍规模1-3人的有29个学位点，占比24.79%，近四分之一；规模4-5人的学位点有18个，比例为15.39%，此二者所占比例合计高达40.18%，由此可知部分学位点导师队伍人数较少，这与一些学者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刘献君等学者对514所高校的高教研究机构进行调查发现，高教研究机构人员规模平均为8.9人，专职与兼职人员的数量及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同时，还应看到导师规模在硕博学位点、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层次高校之间也有显著差异，具体情况见表3。以高校类型为例，师范类高校高等教育学学位点主要以教育学一级学科为依托，获批准相对容易，其受重视程度不够，远不如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等涉及

基础教育的一些传统二级学科；与之相比，理工类、综合类高校更重视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正因为学科基础差、师资水平弱，其高度重视梯队建设，并以此为核心来不断增强学科实力和研究水平。

表3 我国117个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导师队伍规模分布情况

	1-3人		4-5人		6-10人		11-15人		16人及以上		合计	
	N	%	N	%	N	%	N	%	N	%	N	%
硕博点	26	27.37	14	14.74	38	40.00	15	15.79	2	2.10	95	100
博士点	3	13.64	4	18.18	7	31.82	5	22.72	3	13.64	22	100
高校类型												
师范类	17	41.46	8	19.51	12	29.27	3	7.32	1	2.44	41	100
综合类	8	20.51	5	12.82	16	41.03	9	23.08	1	2.56	39	100
理工类	2	6.45	5	16.13	13	41.93	8	25.81	3	9.68	31	100
其他	2	33.33	0	0	4	66.67	0	0	0	0	6	100
高校层次												
"985工程"高校	2	6.45	6	19.36	9	29.03	11	35.48	3	9.68	31	100
"211工程"高校	5	20.00	4	16.00	10	40.00	4	16.00	2	8.00	25	100
地方高校	22	36.07	8	13.11	26	42.62	5	8.20	0	0	61	100
合计	29	24.79	18	15.39	45	38.46	20	17.09	5	4.27	117	100

第二，导师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导师队伍的年龄分布情况如图3所示。导师群体的平均年龄为47岁，其中，硕导平均年龄47岁，博导平均年龄54岁；年龄为61岁及以上且依然奋斗在科研前沿、指导研究生的导师仍占据一定比例，硕导为3.45%，博导为16.40%，以我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开创者潘懋元先生最具代表性，由此可知研究生导师平均年龄较大。导师年龄结构趋大，虽与人文社科领域需要厚积累和丰富经验有一定关系，但也反映出年龄大、资历老在导师队伍管理中存在一定优势。另外，青年学者作为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的重要力量以及未来的主力军，是导师梯队保持生机和活力的新生力量。但从统计来看，比例过低，40岁及以下的硕导占总数的18.05%、博导仅占1.59%。这既与部分高校的副教授、教授人数超编，致使部分年轻人不能顺利晋升、进而达不到研究生导师须为副教授的必备条件有关，也与部分高校的导师信息更新滞后有一定关系，其近几年新增年轻的导师没有及时添加，致使数据不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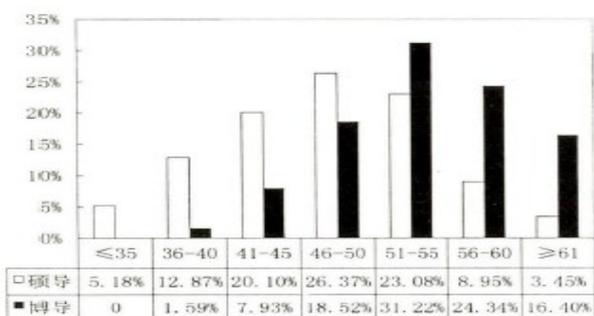


图3 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导与博导在不同年龄段的分布情况

第三，导师职称结构较为合理，虽在不同类型高校、不同层次高校、不同年龄段呈现一定差异，但并不显著。整体来看，导师群体的职称以教授、副教授为主，教授占62.59%，副教授占34.53%，讲师仅占2.88%，这与大部分高校担任硕导必须有教授职称、

担任博导必须有教授职称的要求基本保持一致。不同年龄段的导师职称情况如图4所示。在少部分高水平大学，由于高级职称人员超编等原因，部分青年教师不能及时晋升，但仍有资格和能力担任硕导、博导。一方面，大部分青年教师有博士学位，甚至经历过博士后科研锻炼，具有较强的研究水平和指导能力；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本着人尽其用、鼓励青年教师尽快脱颖而出的原则，选拔部分青年教师积极承担硕导、博导任务，如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高校。笔者在搜集资料过程中还发现，部分高等教育学硕导虽为副教授，但由于其所在高校未有该专业博士点，便在相近专业(教育经济与管理)担任博导，如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的喻凯、程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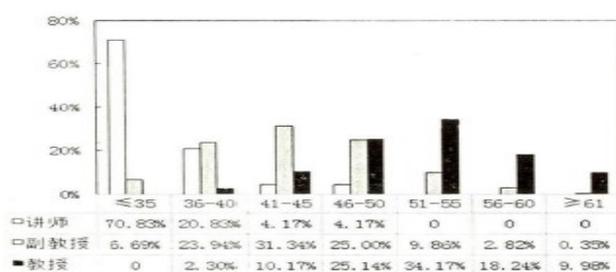


图4 不同年龄段的高等教育学专业导师职称情况

3. 导师性别差异显著

高等教育学男女导师在人数、年龄、职称、专兼职、是否担任职务等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具体情况如表4所示。

表4 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不同性别导师人数及比例情况

	男		女		总计	
	N	%	N	%	N	%
角色						
硕士生导师	418	64.81	227	35.19	645	100
博士生导师	158	83.60	31	16.40	189	100
小计	576	69.06	258	30.94	834	100
年龄 (岁)						
≤35	13	36.11	23	63.89	36	100
36-40	39	45.88	46	54.12	85	100
41-45	91	63.64	52	36.36	143	100
46-50	138	67.98	65	32.02	203	100
51-55	165	80.10	41	19.90	206	100
56-60	82	79.61	21	20.39	103	100
≥61	45	84.91	8	15.09	53	100
小计	573	69.12	256	30.88	829	100
学历						
博士研究生	415	67.92	196	32.08	611	100
硕士研究生	72	66.67	36	33.33	108	100
本科及其他	89	77.39	26	22.61	115	100
小计	576	69.06	258	30.94	834	100
职称						
教授	410	78.54	112	21.46	522	100
副教授	160	55.56	128	44.44	288	100
讲师	6	25.00	18	75.00	24	100
小计	576	69.06	258	30.94	834	100
职务						
高校校级领导	79	81.44	18	18.56	97	100
高校行政管理部门领导	102	77.86	29	22.14	131	100
高校二级学院(系、所)长	113	87.60	16	12.40	129	100
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领导	29	90.91	2	9.09	31	100
社会科研机构领导	13	86.67	2	13.33	15	100
小计	327	82.99	67	17.01	394	100
专兼职						
专职	326	62.33	197	37.67	523	100
兼职	250	80.39	61	19.61	311	100
小计	576	69.06	258	30.94	834	100

第一，在人数方面，男性576人，占69.06%，女性258人，占30.94%；男性导师在人数上占据绝对优势，高达三分之二。具体来说，645名硕导中，男性占64.81%，女性占35.19%；189名博导中，男性所占比例高达83.60%，女性仅为16.40%。由此可知，女性导师不仅人数及所占比

例低，而且在更高水平的博导层面，女性导师比例更低。

第二，在年龄方面，40岁及以下年龄段的男女导师人数比例较为均衡，甚至女性导师稍多，但随着年龄增大，男性导师所占比例不断增大，女性导师所占比例则不断下降。有研究认为，40岁左右是学术发展与创造的最佳期，男女差别较小，本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但随着年龄逐步增大，女性学者的学术发展呈现劣势，表明她们受到很多外在因素影响，亟待深入分析。

第三，在职称方面，从讲师、副教授、教授这一序列来看，男性所占比例逐渐增长，女性所占比例则明显下降。具体来说，讲师或副教授职称的男女导师人数比例较为均衡，男性166人，占53.21%，女性146人，占46.79%；但在有教授职称的导师中，女性仅占21.46%，远远低于男性（78.54%）。学术职称是评价高校教师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注重学术职业规划、加强学术交往、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产出更多学术成果是提升学术水平的重要举措，有教授职称的女性导师人数少、比例低，反映了她们在这些方面处于弱势。

第四，在职务、专兼职方面，有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的导师共394人，其中，男性327人，占82.99%；女性67人，占17.01%，有行政职务的男性导师人数远远超过女性导师。在专兼职方面，如表4和图5所示，兼职男性导师比例远远大于女性导师。男性导师中的专职与兼职人数比例为1.30:1，二者几乎相当；女性导师中的专职与兼职人数的比例为3.23:1，专职人数是兼职的三倍有余。由此可知，女性导师以专职为主，男性导师则专兼职人数较为均衡，这反映了女性导师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可能会侧重理论分析、微观研究，男性导师则可能更多地侧重实践经验总结、宏观研究，表明男性导师在高等教育实践和高校管理领域更具话语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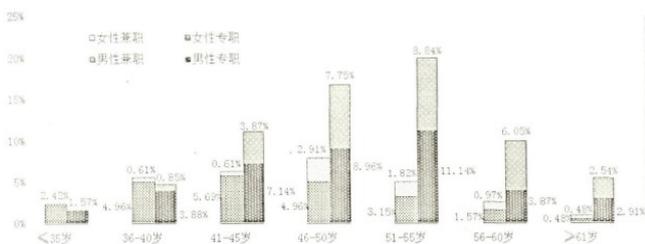


图5 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性别的高等教育学专业导师专兼职情况

4. 导师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存在专兼职比例失衡、担任行政职务人员比例较高等问题

笔者主要从导师队伍的学历及学科背景、专兼

职情况以及是否担任行政职务三方面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专业化程度。

第一，具有教育学背景的博士是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的主要群体。如表1所示，本科及其他学历共115人，占13.79%；硕士研究生108人，占12.95%；博士研究生611人，占比高达73.26%。学历结构基本能反映导师群体的教育水平，而且具有高学历的导师是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的核心力量。虽有部分导师无博士研究生学历，但以中老年学者为主，中青年导师具有高学历已成为常态。比如，61岁及以上的53人中35人无博士研究生学历，比例高达66.04%；51-60人中97博士研究生学历，比例为31.39%；40以下的121有9无博士研究生学历，比例仅为7.44%。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611中，学科背景明确的共有595博士学位的学科分布依次为教育学（66.39%）、管理学（16.81%）、哲学（4.54%）、法学（4.03%）、工学（3.03%）、经济学（2.02%）、理学（1.34%）、历史学（1.17%）与文学（0.67%）等9大学科。从中可以看出，除管理学之外，其他学科所占比例极低；而有管理学博士学位的导师，大多出身于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其研究方向侧重于高等教育，这与部分高等教育研究实力较强的学位点的专业设置有一定关系。比如，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主要侧重于高等教育研究方向；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院校虽无高等教育学博士点，但均在教育经济与管理（或教育管理）专业培养博士生，其研究方向也主要以高等教育为主。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说明教育学背景的博士是导师队伍的主要力量，进而反映了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的专业化程度较高。但是，有两点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其一，在高等教育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范式日益盛行的今日，高度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跨学科导师队伍的组建；其二，从595名有博士学位的导师的学缘结构来看，25.81%来自本校、67.18%来自国内其他高校、7.01%来自国外高校，由此可知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导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极低，不利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化和获得国际话语权。

第二，导师队伍呈现专兼职结合的鲜明特征。从整体看，专职导师占62.71%，兼职导师占37.29%；硕导群体和博导群体的专兼职比例与之大致相似，但硕士点、博士点导师的专兼职比例则呈现一定差异，硕士点专职导师占55.94%、兼职导师占44.06%，博士点专职导师占83.74%、兼职

导师占16.26%，博士点导师队伍兼职比例较硕士点低，专业化程度更高，这反映了博士点对导师的理论水平、指导能力以及投入精力的要求更高。我国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呈现专兼职结合的鲜明特征，这和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有机结合、相互促进的特点保持一致，符合高等教育研究和学科建设须基于社会现实需要而开展的要求。

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导师队伍的专兼职情况，笔者将兼职导师所占比例划分为五个等级：0、0-35%（35%为导师队伍兼职比例的临界值）、35%-50%、50%-100%、100%，与之对应的导师队伍分别称之为专职统治型、专职主导型、专兼职结合型、兼职主导型、兼职统治型，如表5所示。分析发现导师队伍呈现两个特点：其一，兼职统治型和兼职主导型的学位点共36个，占学位点总数的30.77%，比例较高，不利于学位点建设和人才培养；其二，不同层次高校与不同类型高校导师队伍的专兼职情况有一定差异。办学层次越高，导师的兼职比例越低；兼职教师比例按师范类、综合类、理工类序列依次递增，这与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理念紧密相关。大多数综合类高校尤其是理工类高校之前无教育学学科理论积淀，随着自身发展的需要，日益重视高等教育研究，开始设置高教研究机构、整合相关研究人员力量，进而建设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建设理念遵循强烈的“社会需求逻辑”，因此学位点建设之初以兼职导师为主，随后不断增大专职导师的人数及比例，该类型高校学位点具有鲜明的应用性、实践性和服务性，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兼职导师一直是导师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比，师范类高校具有教育学学科的传统优势和理论积淀，建设高等教育学学位点主要遵循“理论逻辑”，以专职导师为主，学位点呈现理论性和基础性特点。

表5 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导师队伍的专兼职情况

	专职统治型(兼职比例0)	专职主导型(0-35%)	专兼职结合型(36%-49%)	兼职主导型(50%-99%)	兼职统治型(100%)
数量	34	24	23	29	7
比例	29.06%	20.51%	19.66%	24.79%	5.98%

第三，具有丰富高等教育实践和高校管理经验的行政人员是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的重要力量。笔者以处级及以上职务为统计标准，834名导师中共有394名担任处级及以上职务，占比高达47.24%。如表1所示，这394名导师中，高校校级领导占24.62%，高校二级学院（系、所）长占33.25%，高校行政部门领导占32.74%，教育行政部门（教育部、教育厅、教育局等）领导占5.58%，社会科

研机构领导占3.81%。具体来说，理工类高校占35.28%，综合类高校占33.50%，师范类高校占25.38%，其他类型高校占5.84%；地方高校占46.95%，“211工程”高校占26.90%，“985工程”高校占26.14%；硕导占74.61%，博导仅占26.39%；教授占82.23%，副教授占17.77%；专职导师占31.73%，兼职导师占比高达68.27%。综上，具有处级及以上行政职务的导师是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校导师队伍的重要力量，且在硕导群体、兼职导师群体、教授群体中的比例很高，呈现出行政人员通过担任兼职硕导、兼职人员的身份融入高等教育研究和人才培养之中的格局。

三、结论与建议

1. 结论

通过对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117个学位点的834名研究生导师群体状况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学位点分布不均衡。首先，区域分布不均衡，博士点比硕士点少且分布更集中，更不均衡；其次，学位点向高层次高校和师范院校集中；再次，学位点分布虽呈现不均衡性，但在各自所处区域具有显著影响。我国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分布现状与高等教育力量的布局状况类似：政治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高等教育较发达、高校数量较多的省份，其高等教育学硕士点就较多且具有一定数量的博士点。我国省份之间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影响着高等教育发展水平和布局的不均衡，影响着高等教育学研究实力和学科建设水平的不均衡，导致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分布不均衡。但是，对单一的学位点建设来说，高等教育学学位点源于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实需要，是伴随高等教育研究水平以及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高而发展起来的，为什么设立、谁设立和设立基础才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因此，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分布现状及影响因素尚需深入探究。

第二，导师队伍的建设不合理。研究生导师队伍的建设是高等教育学学位点和学科建设的关键，从梯队规模、年龄结构和职称结构来看，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建设呈现人数不足、年龄偏大、梯队断层、骨干力量后继乏人等情况。例如，56岁及以上年龄的博导占总数的40.74%，这意味着近一半的博导在未来5年内将退休，很多学位点的导师力量将被削弱，甚至个别学位点将出现无导师现象。有研究表明，一个研究梯队中处于最佳创造年龄的人数比例越高，其年龄结构越合理，而超过最佳创造年龄的人数过多，则具有老龄化特点。正是中青年

导师尤其是青年导师的数量不足，直接影响了导师队伍的新陈代谢，形成老龄化现象。因此，扩大高等教育学专业导师队伍规模，优化导师队伍年龄结构以及加大培养和选拔年轻导师的力度，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第三，导师队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女性导师的总人数、高职称人数、博导和有行政职务的人数均明显少于男性导师，且在职位、学术声望和研究水平等方面普遍低于男性导师，充分说明女性导师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处于弱势地位，揭示了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分层明显且以男性为主的话语结构，这与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余秀兰等学者分析了《高等教育研究》载文的数据，认为女性学者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处于不利地位；魏顺平等学者运用h指数方法评出了中国大陆地区“1998-2007年高等教育研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47位学者”，其中女性4人，仅占5.4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2015年选出的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共169人，女性24人，占14.20%；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13年评选的30位“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均为男性；王饮寒和喻恺2014年对我国1166所普通本科高校6765位校级领导的统计发现，女性领导仅有770位，占11.4%。事实上，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群体以女性居多，但女性学者和导师却未达到应有比例，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的女性比例也较低。因此，女性学者的职业发展和职务晋升还需给予更多的学术研究和政策支持。

第四，导师队伍专业化程度较高，但存在专兼职比例失衡、担任行政职务人员比例较高等问题。提高导师队伍专业化程度是提升高等教育研究水平、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以及巩固高等教育学学科地位的重要举措。但是，高等教育研究的实践性特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主体的“群众性”以及高等教育多学科研究范式流行，使得跨学科与专业化成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二律背反”悖论。正如笔者的统计，导师队伍中兼职导师（37.29%）、担任处级及以上职务的导师（47.24%）、兼职统治型和主导型学位点（30.77%）的占比都较高。李均等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部分导师素质不高、指导不力。以兼职导师和担任行政职务的导师为例，他们具有一定的高等教育研究经验，撰写了一些研究论文或著作，但高等教育研究与指导研究生是不同性质的工作，前者有一定工作经验和相关理论即可，

而后者不仅需要较高的理论水平和较强的科研能力，还需要接受过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系统训练。笔者在搜集信息时还发现，部分导师从未在高等教育类核心期刊发表过文章，部分学位点的导师甚至全是有行政职务的兼职导师，这既反映了部分高等教育学学位点遴选导师不规范，有行政职务人员可随意涉足高等教育学专业，也表明部分学位点的导师队伍构成不合理、专业化程度低，揭露了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任重道远。

2. 建议

基于对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导师群体特征的分析，提出以下加强学位点和导师队伍建设的建议。

（1）制定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学位质量标准，加强学位点质量管理。30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学位点迅速增加，但学位点的整体实力、师资水平和学生培养质量却参差不齐。加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制定学位质量标准，进一步明确研究生培养目标等举措的实施显得日益迫切。

第一，加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建构，明确学科地位。自2009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联合发布实施《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设置与管理办法》后，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合法性建制正在逐渐丧失。浙江工业大学等将二级学科研究生指导教师调整为一级学科研究生指导教师，一些具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点（博士点）的高校则把高等教育学作为教育学的的一个培养方向，使其在招生、培养及课程设置等方面与教育学其他专业趋同，高等教育学的特色日益减弱。因此，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必须突破我国现有学科专业制度的约束。随着许多学者呼吁按照一级学科来建设高等教育学，明确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加强学科体系建构，重视核心理论研究，增强学科自信和学科特色，开创学科建设新思路已成为高等教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重要使命。

第二，制定我国高等教育学专业学位质量标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全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协作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自2002年起先后召开了“高等教育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研讨会”、“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学科建设与发展”等会议，提议由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牵头组织，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院校负责研制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标准。时至今日，这一工作因各种原因仍未提上日程。笔者建议，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需尽快牵头组织制定高等教育学专业学位质量标准,在深入了解社会需求和学生就业状况的基础上,做好科学规划和调研论证,明确研究生培养目标,并以此标准加强学位点质量管理和考核。

第三,构建高等教育学学科理论与实践的贯通机制。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中大量人员兼具实践者与研究者双重身份,充分反映了高等教育学学科紧紧扎根实践的优良传统,极大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科学研 究、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这是建设高等教育学学科的优势而非劣势,如何真正有效地利用这一优势,从而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对接、理性研究者与实践参与者的统一,需要我们努力探索。潘懋元先生认为,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既宽又厚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积极关注高等教育改革与实践,坚持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相互促进是具有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有效路径。因此,聚焦问题、植根实践、服务改革是构建高等教育学理论与实践贯通机制的关键环节。

(2)完善导师队伍遴选、管理与评价机制,加强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导师队伍建设是学位点和学科建设的关键,已有研究过于关注研究课题和学术论文等成果,缺乏对师资队伍 的评估与问题分析。学科建设和研究生培养都离不开结构合理的导师梯队。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存在规模不大、梯队结构不合理、承担行政职务较多等问题,这与导师遴选不规范、队伍建设缺乏长远规划以及队伍考核不严格等相关。因此,各学位点应根据自己的学科特色和发展规划制定师资队伍 建设规划,形成数量充足、知识结构合理、科研能力较强、年龄梯度合理、素质和学风优良、充满活力的导师梯队,这需要采取科学制定学科发展规划、积极创新导师遴选机制、建立科学有效的导师培训考核机制等举措,不断优化导师梯队结构,实现导师梯队的可持续发展。其中,需要高度关注青年导师、女性导师以及导师国际化状况。

第一,加强青年导师队伍的建设与优化。本研究中40岁及以下的青年导师比例较低,青年博导更是寥寥无几。青年导师作为导师队伍的现有重要力量和未来主体,他们的培养与发展尚未引起足够重视。青年导师普遍有高学历、科研能力强等特点,要打破博导必须是教授、硕导必须是副教授的硬条件,大力选拔优秀青年教师担任硕导、博导;同时,青年导师往往存在角色转型期的困惑,缺乏指导研究生的经验,工作压力较大和缺乏团队支持等

问题,需要积极创新管理体制,加强青年导师培训,采取老中青结合的“传帮带”机制等举措推动青年导师快速成长。

第二,关注并支持女性学者的学术职业发展。高等教育学专业导师群体存在多方面的性别差异,女性学者的职业发展和职务晋升还有提升空间。其一,目前学术职业中女性群体的现状和困境虽有一些研究,但重视程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客观评价女性学者的学术能力与实力。其二,加强制度设计和政策支持,积极协助女性学者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给有学术潜力的青年女性学者。其三,高等教育学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扩大女性学者尤其是高等教育学科女性学者的职务晋升渠道,提升高校管理层中女性的人数、地位及话语权。

第三,加大引进留学人才的力度。高等教育学导师队伍中的博士比例虽高达73.26%,但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师资仍较少,其中有国外博士学位者仅占7.01%,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高校,且主要毕业于日本、韩国、俄罗斯等 国院校以及不知名的部分欧美院校,世界一流大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极少。目前,正推进国际化战略的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战略定位为“小规模、高水平、国际化”的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机构中国际化程度较高的,但其师资的国际化水平也不太理想。面对这一现状,有条件的学位点需采取国际化战略,积极创造条件、不断完善相关政策,在人才引进、学术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不断提高师资队伍 的国际化程度,增强国际学术合作与交流能力。其一,坚持将博士学位作为招聘教师的基本条件,优先录用有留学背景的人才,不断提高有国外留学经历乃至毕业于世界一流大学的师资人数和比例。其二,利用各种资源,大力支持教师到国外进修、访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学术交流,与国外机构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培养研究生,积极招收留学生等。

(李明忠,河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河北保定 071002;褚照锋,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北保定 071002;邵攀,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北保定 071002;魏丽颖,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北保定 071002;张菊,河北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河北保定 071002)

(原文刊载于《高等教育研究》2016年第7期)